

從近代初期季風亞洲的荷蘭語學習看 臺灣荷蘭時代的殖民地語言現象與遺緒*

邱馨慧**

摘要

荷語在歐洲歷經口語、拼音與書寫的標準化過程，其間宗教與語文的結合對國家建構具有一定作用。近代初期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在季風亞洲地區進行商業與殖民擴張時，荷語也藉由公司語言政策在殖民地與根據地得到進一步推廣，成為殖民建構重要的一環；荷蘭甚至成為繼葡萄牙之後，開啟歐洲人對當地連續殖民的歷史。臺灣在荷蘭統治時代也經歷過類似的過程。筆者透過比較研究，欲呈現臺灣原住民與東印度公司在傳教與教育互動的特點。

討論地區包括東印度公司設置長官的區域：島嶼東南亞所屬摩鹿加群島與爪哇，及南亞的錫蘭；另外，以日本為例說明東印度公司商業根據地另類學習荷語的經驗。前者在面臨既有通用語——馬來語和葡萄牙語的語境中，公司推廣荷語最後仍力有未逮；後者在貿易實務和鎖國時期唯一接觸的歐洲國家前提下，幕府要求學習荷語，荷語也吸納追求西方新知的知識分子，開創「蘭學」，並奠下未來走向開國的基礎。

臺灣雖然被視為東印度公司對當地人施以荷語教育成效最為卓著的地區，然而其所面對的語言環境並不單純。透過現存原住民語彙資料的分析，筆者探討語言接觸下產生外來語採借的例證與歷史因緣，說明原住民語言也曾受到其他南島語言如他加祿語和馬來語的影響；閩南語同時也是目前看來被採借與訛化最多的語言。至於荷語在不同原住民社會與文化機制的作用下產生的成效亦當不同；荷語的語音，語彙概念與制度在今天的南臺灣確實有跡可尋。要言之，本文著重在

* 本文初稿曾發表於為曹永和院士九十壽誕暖壽，由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臺灣與海洋亞洲研究領域發展計畫主辦之「臺灣與海洋亞洲國際學術研討會」，2009年12月4-5日，感謝評論人張增信教授與在場學者提出的寶貴意見。本文寫就期間，承蒙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同仁李卓穎教授惠閱並提出具體建議；對於兩位匿名審查人細心審閱，不吝指出文章題目、結構與論述應予調整與修正之處，及編輯委員對日文拼音的指正，謹在此致上謝忱。最後，筆者對內文未竟之處，文責仍當自負。

**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助理教授

來稿日期：2012年10月24日；通過刊登：2013年2月20日。

時間深度的縱軸與空間廣度的橫軸上，呈現值得關注、沉潛與連續的歷史語言現象，同時在宏觀的全球化過程中揭示微觀在地的特殊性。

關鍵詞：荷蘭語、荷蘭東印度公司、殖民語言學、臺灣原住民、季風亞洲

- 一、前言
 - 二、荷蘭語的海外擴張
 - 三、季風亞洲地區的荷蘭語學習
 - 四、臺灣荷蘭時代的殖民地語言現象與遺緒
 - 五、結論
-

一、前言

近代初期以來（Early Modern Era，c. 1500-1800 CE），以歐洲為首的國家相繼投入海外貿易與傳教活動，開啟全球範圍的探索、接觸乃至殖民擴張的時代。伴隨著歐洲人來到不同的地理區域，人與物以前所未有的速率，頻繁且多樣地交流，在泛文化的氛圍中，串連起世界各個不同的角落。語言現象（orthography）也在這樣的背景下更顯得複雜而多元。研究殖民時代殖民地語言現象的殖民語言學（Colonial Linguistics），著重歐洲殖民政權藉由傳教或非傳教管道記錄、書寫下來的殖民地語言與語音現象，探討土著語音和語言的文本化對當地社會產生的種種影響，如社會階序、文化差異、宗教與族群認同等。¹ 本文欲探討的反而側重另一個面向——透過殖民脈絡下語言政策的推展，殖民者母語作為外來語言，如何在異地發展？從該角度出發，觀察其中反映出在地語言的複雜性，及歷史過程下外來語言進入、推廣、沉潛、隱沒，乃至以其他面貌延續其影響的可能。

季風亞洲（Monsoon Asia）向來在季風的吹拂下，孕育出人群、語言、文化、宗教與商品流動的歷史，逐利而來的葡萄牙與荷蘭人等歐洲人闖入的正是一個豐富、蓬勃、生機無限的廣大世界。筆者主要觀察對象為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

¹ 關於殖民語言學（Colonial Linguistics）一詞，參見 Joseph Errington, “Colonial Linguistic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30 (Oct. 2001), pp. 19-39; Joseph Errington 於 2008 年出版專書，書名為 *Linguistics in a Colonial World: A Story of Language, Meaning, and Power* (Malden, Mass.; Oxford: Blackwell, 2008).

(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簡稱 VOC, 1602-1798, 以下簡稱「東印度公司」) 在其所屬季風亞洲殖民地與貿易地區, 如島嶼東南亞 (Island Southeast Asia, 1603-1800) 的摩鹿加群島 (the Moluccas, 即 the Maluku Islands, 香料群島, 包括德那地〔Ternate〕、安汶〔Ambon〕與班達群島〔Banda Islands〕等) 和爪哇、南亞的錫蘭 (Ceylon, 1656-1796, 今斯里蘭卡), 及臺灣 (1624-1662) 推廣荷語 (Dutch, *Nederlands*), 及在地人學習荷語的過程, 進一步釐清荷語海外擴張與東印度公司的關係。日本也是討論觸及的地區, 只是荷語在該地的引介與生根具有不同的屬性。東印度公司在這些地區不僅接觸時間長短和殖民力度不一; 各自也具有不同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與歷史, 包括分歧的語言現象, 使荷語在各地的發展與造成的影響殊異。

臺灣經歷至為特殊的連續殖民歷史, 原住民成為一波接一波殖民浪潮下最直接的面對者。十七世紀時, 東印度公司在臺灣殖民統治近四十年, 原住民在荷蘭改革宗教會 (The Dutch Reformed Church) 的傳教活動下也開始接觸並學習荷語, 其中以南部原住民繼受荷語的過程和程度最值得關注, 為本文的另一個討論重點。筆者在探討臺灣部分時, 將兼顧殖民語言學著重的面向, 從語言的文本紀錄中整理出原住民語言採借與訛化外來語彙的例證, 希望藉此比較研究, 突顯在東印度公司季風亞洲殖民地與貿易地區中, 臺灣原住民荷語學習的特殊性, 同時思考臺灣在荷蘭殖民時期的語言現象, 乃至荷語作為殖民歷史遺緒的議題。

二、荷蘭語的海外擴張

荷語屬西日耳曼語系 (West-Germanic Language), 在歐洲主要指今荷蘭與比利時法蘭德斯 (Flanders) 地區人群所使用的語言, 後者一般稱為 Flemish。荷語的發展歷史大致可分成三個階段: 一、八世紀至十一世紀開始為古荷語 (Old Dutch); 二、十二世紀至十六世紀為中古荷語 (Middle Dutch); 三、從十六世紀迄今為現代荷語 (Modern Dutch)。² 中古荷語時期, 書寫者即是以 *Dietsch*

² Pierre Brachin, *The Dutch Language: A Survey*, trans., Paul Vincent (Cheltenham: Thornes, 1985), pp. 1-9; 關於荷語的歷史與一般資訊, 另可簡要參考「Dutch Language」網站, 下載日期: 2012年8月31日, 網址: <http://www.dutchlanguage.info>。

或是 *Duutsch* 稱呼自己的語言。³

荷語自中世紀以來，便在複雜、不同的方言中進行標準化過程（standardization），屬於逐漸規範下來的語言。1525 年融合南、北地區方言的《新約聖經》先行出版；1592 年，當時的荷蘭共和國（The Dutch Republic, 1581-1795）基於整體對共同語文的需求，開始以「最一般、清楚與正確的語言」翻譯整部聖經。來自不同方言地區的譯者和校訂者組成委員會，直到 1637 年才完成聯省議會（States-General）資助、出版的國家版聖經（*Statenbijbel*）。幾乎所有的新教徒（Protestants）均使用這部聖經，在家庭、學校與教會活動中不斷詠唱、誦讀，沿用三百多年直至 1951 年，對於語文的標準化具有一定的作用。⁴ 荷語的標準化過程也包括拼字與書寫。十七世紀時，拼字與書寫的形式仍未一致，拼字方式以羅馬字母拼寫出各地習慣的語音。⁵ 現今討論當時書寫體的論著大多引用字體學家 Jan van den Velde（1568-1623）的專書 *Spieghel der Schrijfkonste*（《書寫藝術》）。⁶ Van den Velde 將書寫體分成四類：方形分寫體、直立連寫體、前傾連寫體與後傾連寫體；這四種字體均見於東印度公司檔案，其中又以連寫體最為常見。⁷ 書寫體的研究將有助於理解當時的書寫習慣，進而一窺書寫教育的內容與形式。整體看來，無論在口語、拼字與書寫，荷語在歐洲都經過標準化的歷程，且與荷蘭共和國的國家建構（state formation）並行發展，在當時激烈的宗教分歧與對抗中，建立起語文和信仰的認同，展現並塑造出國家的權力。

荷語的擴張，誠然是荷蘭共和國以聯合東印度公司與西印度公司（De Geocroyeerde West-Indische Compagnie 或 West-Indische Compagnie，簡稱 WIC，1621-1792）從事海外貿易、傳教與殖民活動的結果。荷蘭在南美洲的殖民地荷

³ 其實指涉 Flemish、Brabantic、Hollandic 及 Limburgic 等語言。參見 Colette M. van Kerckvoorde, *An Introduction to Middle Dutch* (Berlin;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993), p. 1.

⁴ Pierre Brachin, *The Dutch Language: A Survey*, trans., Paul Vincent, pp. 14, 21-22; Peter Burke, *Towards a Social History of Early Modern Dutch*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8.

⁵ 荷語的拼字，直到現在都還在進行標準化。例如荷蘭語言協會（de Nederlandse Taalunie），每 10 年出版一次官方統一的單字總集（woordenlijst），稱為 het Groene Boekje（The Green Book）。

⁶ Jan van den Velde 的專書 *Spieghel der Schrijfkonste* (Mirror of the Art of Writing), Rotterdam, 1605. 封面文字：Spiegel der schrijfkonste, in den welcke ghesien worden veelderhande Gheschriften。參見「Rijksmuseum(荷蘭王家博物館)」，下載日期：2012 年 8 月 23 日，網址：<https://www.rijksmuseum.nl/en/search/objecten?q=spiegel+der+schrijfkonste&p=1&ps=12#/RP-P-1964-2114,0>。

⁷ 程紹剛譯註，《荷蘭人在福爾摩沙》（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頁 x-xi。

屬蓋亞那 (Nederlands Guyana)，於 1975 年獨立建國成立蘇利南共和國 (the Republic of Suriname)，也是以荷語作為官方語言與文字。在殖民地地區，荷語同時也發展出不同的混合語 (pidgin 或 creolized language)，最為人所知的即南非語 (Afrikaans)，不僅是南非官方語言，也通行於納米比亞 (Namibia)，與荷語大致相通。⁸

荷語在南美洲與非洲的延續至為明確。但在亞洲地區，荷語卻如同東印度公司在各地留存的城堡、商館等建築物一般成為歷史遺跡。⁹ 東印度公司在亞洲隨著季風吹送路徑，建構出連結各個區域的航運網絡。歷史學者以「扇」(fan)的意象來描述該公司在亞洲的活動區域：以亞洲總部巴達維亞 (Batavia, 1619-1799) 為中心，扇軸外延西可至摩卡 (Mocha) 與波斯，東達日本及摩鹿加群島；從南亞、東南亞經由麻六甲海峽到日本；錫蘭也成為印度、波斯與葉門之間的轉運站。¹⁰ 然而，在此廣大地域，東印度公司首先得面對同是歐洲勁敵的葡萄牙、西班牙與英國人，接著是各地區強弱程度不一的當地政權。當時東印度公司不僅在武力上無法佔有絕對優勢，人員也必須適應各地不同的風土。¹¹

1650 年，東印度公司主管將亞洲貿易分成三個類別：一、「透過自己的征服」，包括佔有班達群島和福爾摩沙¹² (臺灣) 而取得的貿易；二、「公司訂立獨占契約」，如在德那地與安汶；三、「經由協議」，如透過與當地國王或統治者的交涉而能進行貿易，公司並無任何特殊權利。公司依據點規模和土地權力大小，設置相應的管理官職，依次為具有領土管轄權力的長官、主管重要貿易據點的指揮官、負有軍事責任的司令官，及管理規模較小據點的駐在官或主管 (*opperhoofd*, *supreme head*)。此一時期設置長官的地區包括摩鹿加群島 (安汶、班達)、臺灣、印度東南海岸的科羅曼德爾 (Coromandel)、錫蘭，及麻六甲 (Malacca)；日本

⁸ 「Dutch Language」網站，下載日期：2012 年 8 月 31 日，網址：<http://www.dutchlanguage.info>。

⁹ 例如建築物的刻字，關於荷蘭海外擴張與都市設計，參見 Ron van Oers, *Dutch Town Planning Overseas during VOC and WIC Rule (1600-1800)* (Zutphen: Walburg Pers, 2000)。

¹⁰ Femme S. Gaastra,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Expansion and Decline* (Zutphen: Walburg Pers, 2003), p. 121; Els M. Jacobs, *Merchant in Asia: The Trade of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during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eiden: CNWS Publications, 2006), p. 5.

¹¹ Femme S. Gaastra,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Expansion and Decline*, p. 37.

¹² 為行文方便，西文所稱的福爾摩沙，以下不區分時代均稱臺灣。

和帝汶（Timor）則設置主管。¹³ 基於各地不同的情況，荷語的推廣並非全然有強力的後盾支持；此外，葡萄牙語的傳布，加上亞洲原本就複雜、多元的語言環境，均使荷語在亞洲的處境和發展力有未逮。

以上的討論可以看出，宗教和語文的結合乃是歐洲長久以來的生活方式，也是後來荷語等西方語文進行海外擴張時最基本的模式，成為殖民建構（colonial formation）重要的一環。基於殖民地的現實，歐洲人試圖在海外維持家鄉的生活方式，因此宗教氛圍的建立，不僅出於向異族傳教的使命；同時語文也是向殖民地人群發號施令、施展威權的工具。然而為達有效溝通，殖民者往往必須在植入自己的語言、採用當地習用語言、或兼採兩者之中有所定奪。另一方面，殖民地人群對於殖民者語文採取的態度，也是外來語文能否發展和存續的關鍵。在殖民接觸的情境中，無疑隱藏著更為複雜、交織其間的權力與知識、信仰與文明、認同與實踐等因素，需另以專文進行探討。

職此之故，本文著重在時間深度的縱軸與空間廣度的橫軸上，呈現值得關注的語言現象，並在宏觀的全球化過程中，揭示微觀的在地特殊性。以下以荷蘭東印度公司得以設置長官的島嶼東南亞，包括摩鹿加群島、爪哇，及南亞的錫蘭為例，介紹當地的荷語政策與荷語教育。其次，論述日本的荷語學習以呈現荷語在非公司得以控制地區下另類的發展。

三、季風亞洲地區的荷蘭語學習

近十五年來，前荷蘭殖民地語言政策已成為備受關注的議題。1994年，荷蘭國際亞洲學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 IIAS）在荷蘭萊頓市舉辦以「荷蘭殖民語言政策（The Dutch Colonial Language Policy）」為主題的會議，與會學者聚焦荷蘭殖民東印度與西印度（蘇利南與荷屬安地列斯群島〔Netherlands Antilles〕）時期，在該地區推行的荷語與土著語言政策。研究群體也將朝向比較研究，探討其他歐洲語言在歐洲以外殖民地的發展：如法語在中南半島、非洲與法屬蓋亞那、加勒比海地區；英語在印度、緬甸、馬來西亞及英屬

¹³ Femme S. Gaastra,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Expansion and Decline*, p. 70.

蓋亞那、加勒比海地區；葡萄牙語和西班牙語在亞洲與南美洲等。¹⁴ 1998年，研究成員之一的 Kees Groeneboer 出版 *Gateway to the West: The Dutch Language in Colonial Indonesia, 1600-1950: A History of Language Policy* (《通往西方之路》) 一書，針對東印度公司所在地區的荷語政策提出整體性研究，為本文重視的研究成果。¹⁵

(一) 荷蘭語在島嶼東南亞與南亞

現今的印尼群島，在東印度公司尚未到達前，彼此語言不同的人群即已在交涉與貿易往來上，廣泛地運用馬來語 (Malay)。十五世紀末，葡萄牙人來到亞洲後，葡萄牙語 (Portuguese) 也逐漸發展成「東方通用語」(*lingua franca van het oosten*)。這是一種混合在地語言的葡萄牙語 (Creole Portuguese)，它同時也成為歐洲人與土著族群生下的歐亞混血兒 (Eurasians) 的母語。馬來語，特別是一般所稱的「市場馬來語」(Bazaar Malay, Pasar-Maleis)，也就是簡化或混雜形式的馬來語 (Bahasa Melayu Rendah, Low Malay, Laag-Maleis)，最後也取代了此種混合葡萄牙語，連葡萄牙人也將其運用在傳教與教育方面。¹⁶ 根據 Groeneboer 的比較研究結果，以通用語來說，馬來語大致用於東印度地區，且與伊斯蘭教的傳布有關；葡萄牙語則主要用於該地區的西半部，與基督宗教的傳布有關，同時通行於不同語言的歐洲人、在地人與其他地區的亞洲人之間。¹⁷

葡萄牙人與荷蘭人接踵而至，對荷蘭從葡萄牙手中奪得的殖民地居民來說，無疑是處於連續殖民的境地，學習新語言往往與接受新宗教並行。東印度公司正視馬來語和葡萄牙語在亞洲盛行的事實之餘，針對各地區的狀況，採取務實的荷語政策，主要目的仍是為了傳教。以最早推行荷語的摩鹿加群島為例，東印度公司

¹⁴ 關於 IAS 對此會議的介紹，參見 C.R. Groeneboer (1994 年 3 月 18 日)，"The Dutch Colonial Language Policy"，「IAS NEWS」，下載日期：2012 年 8 月 31 日，網址：<http://www.ias.nl/iasn/iasn3/iasnews/dutch.txt>。IAS 設置於萊頓大學，由荷蘭皇家藝術與科學學院 (KNAW)、萊頓大學、阿姆斯特丹大學 (UVA)、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 (VU) 於 1993 年共同成立。

¹⁵ Kees Groeneboer, *Weg tot het Westen. Het Nederlands voor Indië, 1600-1950. Een Taalpolitieke Geschiedenis* (以下簡稱 *Weg tot het Westen*) (Leiden: KITLV, 1993)。英譯本為 Kees Groeneboer, *Gateway to the West: The Dutch Language in Colonial Indonesia, 1600-1950: A History of Language Policy*, trans., Myra Scholz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1998)。

¹⁶ Anonymity, "East Indian Dutch," in John E. Reinecke, ed., *Oceanic Linguistics Special Publications 14: A Bibliography of Pidgin and Creole Languages* (Honolulu: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5), pp. 338-339。

¹⁷ Kees Groeneboer, *Weg tot het Westen*, p. 28。

在摩鹿加地區設有三個政府（VOC Governments），分別在德那地、安汶及班達。¹⁸ 1605年，荷蘭人從葡萄牙人手中取得安汶並致力將荷語訂為官方語言，兩年後，由一位學校老師（schoolmaster）在安汶成立學校，企圖將原本學習葡萄牙語、信仰天主教的安汶孩童們，「轉變」成為學習荷語、進入荷蘭改革宗教會的改宗者。東印度公司所屬的商人甚至建議當局「買入」一定人數的十多歲當地孩童，將他們留置在安汶要塞中學習荷語，避免他們使用土著母語或馬來語和葡萄牙語等通用語。這個最早的學校便真的在東印度公司的城堡裡成立，故也稱為城堡學校（*kasteelschool*, 1607-1616）。老師每天早上和下午帶著學生學習兩小時的荷語閱讀與書寫，並接受改革宗教教育。¹⁹ 1607至1629年，摩鹿加群島的孩子也分批送往荷蘭學習語言，並熟習歐洲的生活和禮儀。²⁰

1611年，摩鹿加群島的學校使用東印度公司出資在阿姆斯特丹印刷出版的荷語教科書 *AB boeck* (*AB book*)，該書僅有14頁，附上馬來文標題——*Sourat ABC*。由公司商務員 Albert Corneliszoon Ruyll 自行編纂，專門給馬來語地區的年輕人學習荷語字母，旁及練習基督宗教的祈禱詞。翌年，Ruyll 另編纂了同樣由東印度公司出版，題為《馬來語》的學校用書，期許年輕人愉快地學習基督宗教，加強對基督宗教的信念。此書分成兩部分：前60頁包括教化對話、短詩、小故事，以荷語在左、馬來語在右的方式編排而成；後面附錄80頁改編自1603年出版的《荷蘭語—馬來語字典》。雖然題為《馬來語》，此版本堪稱是現存最古老、荷語作為外語的教材。²¹

看似有所進展的開端，最後仍少有成果。1610年代，不僅東印度公司士兵和職員以馬來語與安汶人交談；首位到安汶傳教的牧師 Caspar Wiltens（1615-1619）認為安汶人「不夠聰明，還十分懶惰」，摩鹿加人也認為荷語遠比拉丁文更難學習，

¹⁸ Muridan Widjojo, *The Revolt of Prince Nuku: Cross-Cultural Alliance-Making in Maluku, c.1780-1810* (Leiden; Boston: Brill, 2009), p. 1.

¹⁹ Kees Groeneboer, "The Dutch Language in Maluku under the VOC," *CAKALELE* 5 (1994), p.1; Ben Koolen, *VOC & Onderwijs: Een Inventarisatie* (Assen: Boekwinkeltjes, 2011), pp. 85-86.

²⁰ Ben Koolen, *VOC & Onderwijs: Een Inventarisatie*, pp. 41-44.

²¹ Kees Groeneboer, "The Dutch Language in Maluku under the VOC," pp. 2-3. 《馬來語》教本荷文書名為 *Spiegel vande Maleysche tale*，譯成英文為 *Mirror of the Malay language*。前半部改編自 *Vraaghoecxken van S. Aldegonde* (*Question booklet of S. Aldegonde*)。

視學習荷語為畏途，因此 Wiltens 牧師放棄在學校和教會使用荷語，改用馬來語。²² 在安汶，最後仍是基於傳教，荷語學習才能逐漸復甦。安汶卸任長官 Adriaen Block Martenszoon (1614-1617) 甚至建議新任總督，可以嘗試每年從荷蘭帶來 30 至 50 位荷蘭男孩，讓他們在學校與安汶孩童共同學習。然而第二位到安汶的牧師 Sebastiaan Danckaerts (1618-1622) 倒是與 Wiltens 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如果年輕人的荷語更好的話，就可閱讀大部分以荷語書寫的改革宗教會相關書籍，將來可以當地土語或馬來語傳教。對此，Groeneboer 指出，東印度公司方面並不認為馬來語足以用來傳教，避免使用馬來語也是為了減少伊斯蘭教在當地的影響。因此語言還在其次，宗教才是真正用來維繫當地與荷蘭的紐帶。²³

1630 年代，摩鹿加群島地區的學童人數增加，但是以馬來語進行教學卻備受質疑，荷蘭牧師們因此嘗試引進一種當地的語言，以利雙語教學。到了 1660 年代，馬來語在學校的使用不但有增無減，學童也漸漸不懂荷語；最後在 1665 年，巴達維亞的東印度公司當局決定放棄摩鹿加群島的荷語教育。他們認為荷語終究因為太難而不易發展成為通用語，況且在學校教授荷語太花錢了。²⁴ 這也包括班達的情況。1620 年代，班達僅有 Danckaerts 牧師編的馬來語單語教材和字典，荷語在當地人之間並不重要；只是該地區在香料壟斷貿易政策下，由稱為 *perkeniers* 的歐洲農夫移民種植荳蔻和肉荳蔻，因此荷語仍在該社區扮演一定角色。²⁵ 在摩鹿加地區，除了荷語不易推廣外，Groeneboer 還指出東印度公司的語言政策對當地更為深遠的影響，就是反而促使作為通用語的馬來語更為流行，不僅荷蘭人自己逐漸學會，當地人也更習於使用，因此導致數種土著語言，例如安汶本地語言，逐漸消失。²⁶

在爪哇，上述安汶 Martenszoon 長官曾在巴達維亞舊稱的 Jayakarta，親眼目睹

²² Kees Groeneboer, "The Dutch Language in Maluku under the VOC," p. 3; 引文轉引自 F Valentijn, *Oud en Nieuw Oost-Indiën: Vervattende een naauwkeurige en uitvoerige verhandelinghe van Nederlands mogentheyd in die gewesten* (Amsterdam: Van Braam, Onder de Linden, 1724-1726), 5 vols., vol. IV-2, p. 36.

²³ Kees Groeneboer, "The Dutch Language in Maluku under the VOC," pp. 3-5.

²⁴ Kees Groeneboer, "The Dutch Language in Maluku under the VOC," pp. 5-6.

²⁵ Kees Groeneboer, "The Dutch Language in Maluku under the VOC," pp. 7-8; Kees Groeneboer, *Gateway to the West: The Dutch Language in Colonial Indonesia, 1600-1950: A History of Language Policy*, trans., Myra Scholz, p. 34.

²⁶ Kees Groeneboer, "The Dutch Language in Maluku under the VOC," pp. 8-9.

學校教師 Jan van den Brouck 教導的爪哇男童能像荷蘭人一般說、寫荷語。²⁷ 雖然葡萄牙人未能據有爪哇，葡萄牙語和馬來語同樣是匯集此地的不同群體彼此互相溝通的通用語，學校也使用這兩種語言。僅有荷蘭當局設置的救濟院（Armenhuis）、孤兒院（Weeshuis）及學校才要求教、學荷語。十七世紀初，葡萄牙語甚至一度成為比馬來語更為常用的日常用語。雖然荷蘭當局也曾壓制葡萄牙語，結果卻是不了了之，不僅因為巴達維亞住著許多葡萄牙人，更重要的是，學校和教會活動早就在使用葡萄牙語。1670 年代，相較於葡萄牙語和馬來語每週兩次的講道，巴達維亞新建教堂每週僅有一次的荷語講道。²⁸ 巴達維亞當局更指出荷蘭人連在自己家裡也不堅持說荷語，因為許多荷人視能說外語為極大的光榮。在巴達維亞，據悉城裡不少當地出生、成長，有著歐洲父母的荷蘭婦女，比起說生硬的母語更愛說葡萄牙語；已婚婦女，無論歐洲、歐亞或亞裔，彼此間很少、甚至不說荷語。²⁹ 直至十八世紀末，葡萄牙語仍持續使用著，特別是在歐亞通婚的社區。³⁰

反倒是在進入十九世紀後，荷語才開始在荷屬東印度群島（Dutch East Indies，今印尼）被廣泛使用；到了二十世紀初，在印尼殖民社會西化的風潮下，部分本地人也開始在小學接受荷語初等教育，具有荷語知識的人口才逐漸增加。³¹ 殖民時期荷語言政策的討論在印尼後殖民國族主義的氛圍和糾結下，其實更為複雜。研究印尼殖民時期語言遺緒的荷蘭學者，強調荷語對印尼語（Bahasa Indonesia）在文法結構和詞彙方面的貢獻；同時基於印尼語屬馬來語的標準化語域（standardized register），荷蘭殖民政府對馬來語賦予官方語言的認可，造就馬來語在群島內陸地區的廣為使用，其實也正為將來所謂的印尼語成為印尼官方語言奠定基礎。³²

南亞的錫蘭曾被東印度公司期許為建立「新荷蘭」（Nieuw Nederland）的地

²⁷ Kees Groeneboer, "The Dutch Language in Maluku under the VOC," p. 5.

²⁸ Kees Groeneboer, *Weg tot het Westen*, pp. 45-47.

²⁹ C.R. Boxer, *The Dutch Seaborne Empire: 1600-1800* (New York: Knopf, 1965), pp. 251-252.

³⁰ The Indonesian Etymological Project, *Loan-Words in Indonesian and Malay* (Leiden: KITLV Press, 2007), p. xxx.

³¹ The Indonesian Etymological Project, *Loan-Words in Indonesian and Malay*, p. xxxi.

³² 例如 Hendrik M. Maier (2005 年 2 月 8 日), "A Hidden Language: Dutch in Indonesia," 「eScholarship,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下載日期: 2012 年 8 月 31 日, 網址: <http://escholarship.org/uc/item/2cg0m6cq>。

點。³³ 同樣地，十六世紀中期以前，葡萄牙人即在此築城，葡萄牙語也成為當地的通用語；孩童從小均由說葡萄牙語的奴隸保母帶大。當局比較可觀的努力在於增加極度缺乏的荷語師資。1690年，東印度公司仿照臺灣成立荷語和當地語言進行雙語教學的神學院（het Collegium op Formosa，參見下文），也在北部 Jaffnapatnam 地區 Nalloer 設立神學院，用來教育未來擔任學校教師、傳道師、翻譯與書寫的各種人才。1696年，可倫坡（Colombo）另設一所雙語神學院。³⁴ 雖然如此，到了 1730 年代，葡萄牙語仍是通行於錫蘭的重要語言，東印度公司在錫蘭的長官也只得任命說葡萄牙語的傳教士，連同聖經的印刷都捨棄荷語，採用葡萄牙語和當地的兩種語言（Tamulch、Singalees）。1796年，英國人從東印度公司手中奪取錫蘭之後，葡萄牙語仍舊維持著通用語地位，直至十九世紀。³⁵

語言歷史學者提出荷語未能盛行的原因，在於荷人主動採取實用主義政策，因應無論貿易或傳教均須使用外國語，而非母語的困境。³⁶ 這或許解釋了荷語的推廣在季風亞洲面臨的首要挑戰，在於既有的語言和宗教環境下，荷語未能提供足以使在地人加以學習的誘因。值得考慮的是，除了語言和宗教因素外，在地與歐洲的混雜性（hybridity），加上連續殖民歷史過程的形塑，包括政治、社會、族群與文化等因素，也都使得荷語在東印度公司具有領地主導權的殖民地未能取代葡萄牙語的地位。

（二）日本的荷蘭語學習

相較於作為殖民地的上述地點，日本的荷語學習則呈現出另類的取向——具有學習荷語的誘因。首先，東印度公司在日本除了初期從事掠奪葡萄牙、西班牙及中國船隻外，主要仍發展貿易，藉由臺灣轉運站，維持亞洲區域貿易網絡整體的商業利益。³⁷ 鎖國體制完成後，荷蘭成為唯一獲准與日本進行貿易的歐洲國家，為此日本也積極透過往來於歐、亞地區的東印度公司，蒐集最新國際局勢和

³³ Kees Groeneboer, *Weg tot het Westen*, p. 73.

³⁴ Kees Groeneboer, *Weg tot het Westen*, pp. 75, 77, 81. Nalloer 的神學院至 1723 年結束，可倫坡神學院則持續至 1797 年。

³⁵ Kees Groeneboer, *Weg tot het Westen*, pp. 85-87.

³⁶ 尼古拉斯·奧斯特勒（Nicholas Ostler）著、章璐等譯、維舟校，《語言帝國：世界語言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頁 364-365。

³⁷ 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頁 17、24、126。

商貿情報。³⁸ 此外，1641年，位於平戶（Hirado）的荷蘭商館遷移到長崎港內的人工島——出島（Dejima），在追求西方新知的驅使下，長崎逐漸發展成所謂「蘭學」（Rangaku）的中心。

其實日本一開始並非透過荷蘭取得西方知識。十六世紀中期後，與耶穌會士接觸的明朝知識分子陸續將傳入中國的西方書籍翻譯成中文，日本即是靠著這些輾轉由中國傳來的譯本接觸到近代西方知識，江戶也成為學習後來改稱「洋學」的中心。德川幕府禁止基督教在日本傳布後，也曾一度全面禁止包括西學的中譯書籍進入日本，直到1720年，德川吉宗將軍（Shogun Yoshimune, 1684-1751）才開放引進非宗教類的書籍，且任命青木昆陽（Aoki Konyo, 1698-1769）和野呂元丈（Noro Genjo, 1693-1761）學習荷蘭語文。³⁹

的確，剛開始時即使是長崎的翻譯人員，習稱「阿蘭陀通詞」，均不准閱讀荷語書籍，只能靠著口頭學習，完成翻譯任務。⁴⁰ 此外，初期日本與荷蘭之間的貿易仍得透過當時盛行於東亞貿易圈的葡萄牙語，因此東印度公司在平戶商館時期，仍僱用懂葡萄牙語的日本人作為翻譯員。到了長崎，翻譯員逐漸專業化，也成為長崎奉行管理地區的官員，居間扮演日、荷雙方在會話和書寫的中介角色，從事貿易、外交及文化交流的工作；另一方面也監視荷蘭人。⁴¹

出島商館時期，東印度公司派赴的荷蘭人禁止學習日語，因此也必須仰賴日本人譯員，然而或因缺乏相關的文法和字典等書籍，十七世紀時，商館方面並不滿意日本譯員的表現。⁴² 在缺乏學習材料的情況下，日人如何學習荷語呢？他們極可能藉由工作過程，以邊聽、邊說的「自然學習法」學習荷語。蘭學先驅新井白石（Arai Hakuseki, 1657-1725），當初即是以日本假名拼寫荷語，採取先記音，再標注意義的方式。到了青木昆陽學習荷語時，改採以漢文標註荷語單詞的意

³⁸ 即《荷蘭風說書》，參見松方冬子，《オランダ風説書と近世日本》（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7）。

³⁹ Suketoshi Yajima, "The European Influence on Physical Sciences in Japan," *Monumenta Nipponica* 19: 3/4 (1964), pp. 344-345.

⁴⁰ Suketoshi Yajima, "The European Influence on Physical Sciences in Japan," p. 345.

⁴¹ Yumiko Torii, "Dutch Studies": Interpreters, Language, Geography and World History," in Leonard Blussé, Willem Remmelink and Ivo Smits, eds., *Bridging the Divide: 400 Years The Netherlands-Japan* (Hilversum: Teleac/ NOT; Leiden: Hotei Publishing, 2000), pp. 117-118.

⁴² Yumiko Torii, "Dutch Studies": Interpreters, Language, Geography and World History," p. 118; Grant K. Goodman, *Japan and the Dutch, 1600-1853* (Richmond, Surrey: Curzon, 2000), p. 36.

義，再以漢文理解句意，首創漢文訓讀的荷語解讀法。十七世紀末，日本譯員面對葡萄牙語的機會遠比荷語來得多，直至十八世紀，才出現有外人讚許日人荷語能力的紀錄。⁴³

日本人荷語的進步，正是利用了輔助學習的荷語教科書的緣故。1749 年到 1758 年春天，青木昆陽利用荷蘭商館館長等一行人留在江戶參府的機會，靠著阿蘭陀通詞的幫助，一一聽寫、記錄下單字，同時以荷蘭境內普及的教科書為基礎，例如《正書教法》，輯成十集《和蘭文譯》。⁴⁴ 當時日本荷語的學習向來以經驗傳承的師徒制為主，特別是無法接觸到荷蘭人和進口書籍的江戶蘭學者。他們學習荷語，一般由老師教導，學生一個字、一個字地學並背記，藉由老師或學習前輩的幫助，配合荷語字典學習閱讀，試著揣摩文意。1788 年出版《蘭學階梯》(*Rangaku Kaitei*) 的大槻玄澤 (Otsuki Gentaku, 1757-1827)，曾在長崎阿蘭陀通詞家中寄宿，隨後便在江戶開設私塾，傳授荷語。⁴⁵

江戶的通詞西善三郎 (Nishi Zenzaburo, ?-1768) 曾嘗試從《荷蘭語—法語字典》(François Halma 編纂) 編譯《荷蘭語—日本語字典》，然而他未竟功成即告辭世。後繼者接續這種經由第三語言的方式，終於在 1796 年編譯出版首部《蘭日字典》。相同的嘗試也在長崎開展。嫻熟日語且後來成為日本荷蘭商館館長的 Hendrik Doeff Jr. (1777-1835)，1811 年起與日本譯者仍以 Halma 版字典為本，共同編纂後來稱為 *Nagasaki Halma* 或《道譯ハルマ》(*Doyaku Halma*) 的字典，該書直到 Doeff 離開日本後才完成，並於十九世紀中期以後出版。⁴⁶

日本學者至十八世紀才開始接觸並學習荷語文法。志筑忠雄 (Shizuki Tadao, 原名中野忠次郎，號柳圃，1760-1806，阿蘭陀通詞志筑家養子)，身為通詞也是

⁴³ Jiro Numata, "The Introduction of Dutch Language," *Monumenta Nipponica* 19: 3/4 (1964), pp. 243-244; 茂住實男，〈文法=訳読法の成立過程〉，《日本英語教育史研究》2 (1987)，頁 133-149。

⁴⁴ 片桐一男，〈未刊蘭学資料の書誌的研究 2〉(東京：ゆまに書房，2006)，頁 27、42、48。《和蘭文譯》可能是以 1727 年 B. Hakvoord 出版的 *Oprecht Onderwys van de Letter-Konst* (《正書教法》) 為本。翻譯人員學習荷語的初階教科書除了 *Letterkonst* 之外，也包括 *AB boeck*，參見片桐一男，〈未刊蘭学資料の書誌的研究 2〉，頁 47。

⁴⁵ Jiro Numata, "The Introduction of Dutch Language," p. 245.

⁴⁶ 片桐一男，〈未刊蘭学資料の書誌的研究 2〉，頁 46；Jiro Numata, "The Introduction of Dutch Language," pp. 246-247; Tsutomu Sugimoto, "Hendrik Doeff and the Doeff's Halma," in Leonard Blussé, Willem Remmelink and Ivo Smits, eds., *Bridging the Divide: 400 Years The Netherlands-Japan*, pp. 125-126.

天文學方面的蘭學家，不僅學習文法書，也編成首部日語的荷語文法書《和蘭詞品考》(*Oranda Shihinkō*)，只是並未出版，僅作為教授荷語與蘭學的教材，日後其影響才擴及到江戶的蘭學者。⁴⁷ 此後，日本的荷語學習才跨入以學習外國語為目標的「文法譯讀法」(grammar-translation method)時代，隨著「蕃書和解御用」、「蕃書調所」、「洋書調所」及「開成所」的設立，確立了系統化的學習與傳承制度。⁴⁸ 十九世紀以後面臨外交事務吃緊，日本幕府理解到其他外語的重要性，長崎的譯員開始運用原有荷語的學習基礎和經驗，學習法語、英語、俄語及德語。⁴⁹

從荷蘭人初到日本(1600年)，至鎖國時代結束(1854年)超過250年期間，荷語在日語留下了約350個「外來語」，其中將近一半今天仍在使用，雖然大致訛化了荷語本來的發音而表現出日語發音的特徵。日語採借荷語以航海用語、荷蘭人從本國與巴達維亞引進的飲食與蔬菜居多，後者包括酒類、啤酒、火腿、咖啡、糖漿、荷蘭芹(*Oranda-zeri*)與馬鈴薯(*jaga-imo*)等。⁵⁰

由以上的討論可知，東印度公司在島嶼東南亞和南亞殖民區域，特別是處於連續殖民的地區，馬來語和葡萄牙語在東印度公司殖民前已成為在地通用語，盛行於殖民地社會一定的階層當中。基於現實的考量，馬來語受到東印度公司殖民語言政策的扶植，更深入內陸，普及率也大為增加；而荷語只能在傳教目的主導下，政策性地在教會和學校予以推廣。相較之下，日本的荷語學習卻是在禁止傳教的背景下，由日本方面主動培養荷語翻譯人員處理外交與貿易事務，並從東印度公司蒐集的海外情報掌握國際情況，同時吸納求取西方新知的知識分子投入荷語的學習和教學。關於這兩種不同取向，學者指出，阿蘭陀通詞與蘭學者學習荷語的目的，前者首重會話，以進行貿易業務、外交交涉為主，翻譯為副；後者則以從事蘭學研究和翻譯為主要任務。⁵¹ 基於這些動機而積極展開的荷語學習和成果累積，不久即為日本近代的科學發展立下基礎，並促使日本走向開國與西化的

⁴⁷ Jiro Numata, "The Introduction of Dutch Language," pp. 247-248.

⁴⁸ 茂住實男，〈文法=訳読法の成立過程〉，頁139-145。

⁴⁹ Tsutomu Sugimoto, "Hendrik Doeff and the Doeff's Halma," p. 126.

⁵⁰ 例如音節以母音結尾、兩個中間子音夾著母音、「l」發音改為日語習慣的「r」等。參見 Isabel Tanaka-Van Daalen, "Dutch Words and Expressions in Japanese," in Leonard Blussé, Willem Remmelink and Ivo Smits, eds., *Bridging the Divide: 400 Years The Netherlands-Japan*, p. 129. 馬鈴薯(*jaga-imo*)實指 Jagatara (Jakarta) 來的 potato。

⁵¹ 片桐一男，〈未刊蘭學資料の書誌の研究2〉，頁254。

道路。⁵² 東印度公司在島嶼東南亞和南亞殖民地推廣荷語，相對於商館所在地日本主動學習荷語的經驗，皆說明在地語言環境的關鍵性影響，和基於需求、主動傳承的重要性。這是討論臺灣在荷蘭殖民時期、乃至「後荷蘭殖民時期」語言現象的起點。

四、臺灣荷蘭時代的殖民地語言現象與遺緒

荷蘭時代的臺灣，相較於島嶼東南亞，語言複雜度並不遜色。同樣都是操持南島語系語言，臺灣原住民卻擁有 20 多種不同種類的語言，彼此間的分歧和差異比起島嶼東南亞的南島語言還要大。⁵³ 除此之外，即使大部分僅及大員（Tayouan），旁及對岸周邊地區，臺灣也曾經是來自歐洲、印度、東南亞、甚至南美洲等族群的匯聚之處，⁵⁴ 可以想見在當時的臺灣聽聞到各種奇異難懂的「馱舌之音」，當是日常生活的尋常之事。

同樣處在多元與分歧的語言環境，比較東印度公司在其他殖民地的荷語教育實施和成果，研究者多半認為臺灣是相對「較為成功」的例子。⁵⁵ 賀安娟（Ann Heylen）指出當時的臺灣並沒有像麻六甲、巴達維亞與錫蘭一樣，原先就有葡萄牙或馬來語作為通用語。⁵⁶ 這點也為 Groeneboer 所認同，他認為臺灣並沒有一個通用的日常語言（*omgangstaal*），反倒有各種不同的村落方言（*dorpsdialecten*），使得荷語在此地可能比較容易發展。⁵⁷

⁵² 關於蘭學者與日本近代化，參見徐興慶，〈德川幕末知識人吸收西洋文明的思想變遷〉，《臺大歷史學報》40（2007年12月），頁149-199。

⁵³ 李壬癸，〈珍惜臺灣南島語言〉（臺北：前衛出版社，2010），頁18。

⁵⁴ 韓家寶、鄭維中譯著，王興安編校，〈荷蘭時代臺灣告令集、婚姻與洗禮登錄簿〉（臺北：曹永和文教基金會，2005），頁64。

⁵⁵ 賀安娟，〈荷蘭統治之下的臺灣教會語言學：荷蘭語言政策與原住民識字能力的引進（一六二四～一六六二）〉（以下簡稱〈荷蘭統治之下的臺灣教會語言學〉），《臺北文獻》125（1998年9月），頁95。Ann Heylen, “Dutch language Policy and Early Formosan Literacy(1624-1662),” in Wei-ying Ku, ed., *Missionary Approaches and Linguistics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Leuven: Ferdinand Verbiest Foundation;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223; Kees Groeneboer, *Weg tot het Westen.*, pp. 72-73.

⁵⁶ 賀安娟，〈荷蘭統治之下的臺灣教會語言學〉，頁95；Ann Heylen, “Dutch Language Policy and Early Formosan Literacy(1624-1662),” p. 223.

⁵⁷ Kees Groeneboer, *Weg tot het Westen*, p. 67.

即使「沒有通用語且語言分歧」是荷蘭人初到臺灣後就觀察到的現象，荷語並非東印度公司的首選。François Caron 長官（1644-1646 在任）尚且期待能在島上眾多的土著語言中，先選取兩、三種用於學校教學。然而 1648 年，下一任長官 Pieter Anthoniszoon Overtwater（1646-1649 在任）在任內開始推行荷語教育，足見該政策最後拍板定案也是歷經波折，好不容易才取得共識。⁵⁸ 學者注意到荷語的推行無形中與教會主張擴張的一方兩相結合，甚至當時熱衷推行荷語教學人士也藉機讚賞臺灣原住民記憶力佳，令人驚訝地可以很快將荷語說出口。⁵⁹ 顯然，採用荷語教育無疑不僅只是語言和溝通的問題，殖民和傳教反而是更為直接的目的，1648 年以後，臺灣的荷語教科書也都與宗教內容有關。⁶⁰ 實施荷語教育的地區與荷蘭改革宗教會宣教區大體一致，包括西拉雅語區、南路地方、虎尾壠二林地區，及 1642 年荷蘭從西班牙手中取得的北臺灣雞籠、淡水地區。⁶¹ 1662 年，荷蘭失去臺灣時，荷語教育也不過推行了十多年；由荷蘭當局的評價看來，各地學習成果往往是「鸚鵡學語」，僅在不斷地重複和記憶，勝於確實理解語文。⁶²

（一）學校教育

對原住民而言，誦讀、聽寫及拼音、拼字，並非學習荷語以後才開始。1636 年起，牧師尤紐士（Rev. Robertus Junius，1629-1643 在臺）開始在新港開辦學校後，即以西拉雅語（「新港語」）教學，並教導新港地區學生以羅馬字母（拉丁字母）將口語西拉雅語拼寫下來。尤紐士的教學方式大致為：將子音和母音的字母分成兩列，寫在一張紙上，要求學生背誦。此外，他也自行編纂一本 *ABC Boek*，

⁵⁸ 賀安娟，〈荷蘭統治之下的臺灣教會語言學〉，頁 95；Kees Groeneboer, *Weg tot het Westen*, p. 67.

⁵⁹ 賀安娟，〈荷蘭統治之下的臺灣教會語言學〉，頁 95；Kees Groeneboer, *Weg tot het Westen*, p. 69.

⁶⁰ 祈禱書（3000 本）、教義問答（2000 本）、約瑟的故事（1000 本）、詩歌集（1000 本）、福音書（1000 本）、青年之鏡（500 本）、聖經史（50 本）、虔誠的實踐（50 本）。參見賀安娟，〈荷蘭統治之下的臺灣教會語言學〉，頁 96。

⁶¹ 這些宣教區名稱參見查忻，〈荷蘭改革宗教會在十七世紀臺灣的發展〉（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1）。

⁶² W.M. Campbell, ed.,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Described from Contemporary Sources with Explanatory Notes and a Bibliography of the Island*（以下簡稱 *Formosa under the Dutch*）（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1992[1903]），pp. 241, 293.

該教材同時也是教義問答，集結主禱文、十誡、信經、祈禱文及詩歌。⁶³ 換句話說，並非一般用於兒童啟蒙的簡單字母書，而是以字母教育的形式編寫用來傳達基督教信仰的教材。

荷蘭改革宗教會也為當時分布於臺灣中部平原的虎尾壠語（Favorlang）留下文本，包括牧師 Gilbertus Happart（1649-1653 在臺）編寫的《虎尾壠語典》（以下簡稱《語典》），及牧師 Jacobus Vertrecht（1647-1651 在臺）編纂的教理和講道詞文本。⁶⁴ 旁及這些虎尾壠語的傳教文本，教會仍致力於荷語的教學，同時也和西拉雅語教區一般，使用本國運送來的教材。⁶⁵ 然而第一年學習荷語的情況卻不如預期。1648 年 3 月 Vertrecht 牧師剛在虎尾壠地區對年輕人信心滿滿地進行荷語教學不久，10 月他已去信大員表示學習並無進展，原因是學生缺課和當地疾病橫行所致。⁶⁶ 我們可以透過 1650 年代編成的《語典》來了解 1650 年前後虎尾壠地區的學校教育。⁶⁷ 首先，Happart 牧師紀錄了虎尾壠人使用同一詞 *atillaijas* 稱呼教堂和學校，因此即使建築物可能不同，當地人仍以相同概念理解進行宗教和學習活動的場所。⁶⁸ 荷蘭當局似乎也在無形中強化這樣的連結。1644 年，首度由東印度公司針對原住民正式舉辦的各路地方會議（Landdagen）中昭示：牧師對原住民未積極出席教堂和學校活動極表不滿，因此當局決定對缺席、缺課者懲處鹿皮一枚，繳不出來者，准以鞭打代之，長老必須在來年的地方會議將收集的鹿皮交給當局。⁶⁹ 附帶罰則成為當地人對上教堂和上學的體驗與觀感，在荷語教育實施後也並未改變。

⁶³ Ann Heylen, "Dutch Language Policy and Early Formosan Literacy(1624-1662)," pp. 210-211; 賀安娟，〈荷蘭統治之下的臺灣教會語言學〉，頁 86-87。

⁶⁴ 這些文本均於十九世紀被發現並在巴達維亞出版。詳見李壬癸，〈珍惜臺灣南島語言〉，頁 142。《虎尾壠語典》收於 W. M. Campbell, ed., *The Articles of Christian Instruction in Favorlang-Formosan, Dutch and English, from Vertrecht's Manuscript of 1650, with Psalmanazar's Dialogue between a Japanese and a Formosan and Happart's Favorlang Vocabulary* (以下簡稱 *The Articles of Christian Instruction*) (London: K. Paul, Trench, Trübner&co., 1896), pp. 122-199。

⁶⁵ 查忻，〈荷蘭改革宗教會在十七世紀臺灣的發展〉，頁 142。

⁶⁶ W.M. Campbell, ed.,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pp. 228, 230。

⁶⁷ 關於 Gilbertus Happart 牧師書成《語典》的時間斷限，筆者將另為文說明。

⁶⁸ 請參考詞條 *atil*，詳見 W. M. Campbell, ed., *The Articles of Christian Instruction*, p.124。

⁶⁹ J.L. Blussé, W.E. Milde, Yung-ho Ts'ao, and N.C.Everts,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1629-1662, DEEL II: 1641-1648* (以下簡稱 *Dagregisters Zeelandia II*) (Den Haag: Instituut voor Nederlandse Geschiedenis, 1995);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臺南：臺南市政府，2002），第 2 冊，II-E fo.283-283v。

基於《語典》的實用性，我們可以模擬一下學校設施並掌握學校老師的教學用語：教室內可能掛著統稱為 *atas* 的圖像、繪畫或字母等，也該有書桌 (*tatsipokan*) 供學生寫字、讀書所用。學校老師教授課程 (*atil*)，學生學習 (*pattil*)。⁷⁰ 學校教育特別重視書寫、閱讀與問答，要求學生能夠模仿 (*zimichier*) 和練習 (*dummarram*)，不斷反覆 (*mannapida*)，例如重覆十次，說成 *manna-tschiet*。⁷¹ 閱讀重在讀書 (*tummoch o bido*)，打開書 (*ummilag o bido*)、張開嘴 (*zikat o ranied*)，大聲的讀出聲音來 (*tattaa*)。⁷² 問答則要求能夠回答 (*tummaam*) 出答案 (*tataam*)。⁷³

書寫似乎是學校老師比較費心的部分，我們可以看到許多關於書寫教育的用詞。學生在學校認識書寫工具 (*babido*)，例如筆、畫筆等。筆是帶有羽毛 (*chaar*) 的鵝毛筆，也可以稱為 *taz-ipok o bido*，畫筆是 *taz-ipok*。⁷⁴ 書寫的紙稱為 *barritok*、*badsigne*，一張紙和一頁書都可稱為 *challam*。⁷⁵ 紙通常是捲起來的，因此捲起來的寫本，可稱為 *arron o bido*，*bido* 可指寫本、沾上墨水的紙和書冊。*Pido* 和 *pattas* 為動詞式的書寫，另外可說成 *zimipok*，後者也用於繪畫。虎尾壠人也認識到荷蘭人使用臘 (*ausa*) 並印上 (*tummilla*) 印信以封住書信的習慣。⁷⁶

「文字」即是 *atite*，很會寫字，可以說成 *mauchus o babido*，表示平滑順暢地書寫 (*mabad*)；但是學生也有寫不好的時候，可能就是 *momach*，亦即將大點墨漬滴落在紙面上。⁷⁷ 這時學校老師會予以處罰，Happart 牧師在 *ina* 詞條提出下面的例句，無疑是向虎尾壠人學習其語言的表達方式後，可直接應用在處罰學生的場合：

ina o elli arioon, pattas o bido, ina papagcha jo,
because you do not write well, I will flog you.⁷⁸

(中譯：因為你寫不好，我要鞭打你)

⁷⁰ 雖然學校的規模可能僅只一間教室；W.M. Campbell, ed., *The Articles of Christian Instruction*, pp. 124, 198.

⁷¹ W.M. Campbell, ed., *The Articles of Christian Instruction*, pp. 135, 151, 198.

⁷² W.M. Campbell, ed., *The Articles of Christian Instruction*, pp. 189, 194, 197-198.

⁷³ W.M. Campbell, ed., *The Articles of Christian Instruction*, pp. 188, 190.

⁷⁴ 鵝毛筆可從 *baron o chaar* 和 *kummaat o chaar* 看出，參見 W. M. Campbell, ed., *The Articles of Christian Instruction*, pp. 125-128, 139.

⁷⁵ *badsigne* 參見詞條 *arron*；*challam* 參見詞條 *bia*；參見 W. M. Campbell, ed., *The Articles of Christian Instruction*, pp. 124, 126-127.

⁷⁶ W.M. Campbell, ed., *The Articles of Christian Instruction*, pp. 124-125, 127, 193-194, 198.

⁷⁷ W.M. Campbell, ed., *The Articles of Christian Instruction*, pp. 125, 144, 157, 162.

⁷⁸ W.M. Campbell, ed., *The Articles of Christian Instruction*, p. 127.

虎尾壠地區進行鞭打的教育方式，到了 1654 年執行教學的學校教師更被視為濫用威權的代表，被指責不僅性格偏狹、易怒甚至酗酒，對當地人暴力相向，使得政務官都擔心該區會因此而發生大暴動。⁷⁹ 虎尾壠地區進行堪稱嚴厲的教學，其實早在三年前西拉雅語教區就發生了重大事件，蕭壠的學校教師曾以教鞭粗暴地打在小女孩的頸部致死。⁸⁰ 看來清代地方志所提及、使用鵝毛筆書寫「紅毛字」的「教冊」，應該都經歷過 *momach* 的學習經驗，或許不分世代也曾因此而被處罰過。

1648 年以後，隨著荷語教育的引進，成為本土的西拉雅語和「外來語」雙語發展的現象。在新港地區，西拉雅語羅馬字化與荷語的拼字、書寫及閱讀，同時存在於學校教育和教會活動至少超過 10 年。1657 年，教會提議設置神學校，希望從許多不同的村落選取 10 到 14 歲的孩子收為學生。在預定的教學安排上，仍以雙語並列，學生上午學習「福爾摩沙語」（當指西拉雅語），下午學習荷語，使用由 Comenius 編寫的《語學入門》作為教材，內容包括荷蘭和福爾摩沙語的相似用語。除了荷語的閱讀與書寫外，口語也是關注的重點，學生中每天選出兩名值日生負責記錄在校期間不說荷語、而說其他語言的學生名字，並將名單交給副校長。至於令人詬病的處罰方式則改成學生一旦犯錯，最多只能責打一鞭處罰為限。⁸¹

而北臺灣的雞籠、淡水地區，在東印度公司殖民臺灣的過程中，可說遭遇了類似島嶼東南亞和錫蘭為前葡萄牙殖民地的連續殖民情境。然而，西班牙在北臺灣僅殖民統治 16 年，西班牙語並未像葡萄牙語一般取得通用語的優勢。1655 年牧師 Marcus Masius（1655-1662 在臺）派赴前往該區建立教堂和學校，兩年後的報告即指出，會說西班牙語的當地居民馬賽人（Basayos）已逐漸凋零，新世代卻未解此語。同樣地，此地也是語言分歧，即使西班牙傳教士 Jacinto Esquivel（1631-1633 在臺）認為原住民的通用語馬賽語尚稱易學，Masius 牧師卻不以為

⁷⁹ J.L. Blussé, W.E. Milde, and Yung-ho Ts'ao,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1629-1662, DEEL III: 1648-1655* (Den Haag: Instituut voor Nederlandse Geschiedenis, 1996);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臺南：臺南市政府，2004），第 3 冊，III-E fo. 504v。

⁸⁰ W.M. Campbell, ed.,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p. 277.

⁸¹ 《語學入門》（*The Door or Portal to Language*），參見 W.M. Campbell, ed.,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pp. 306-309; 林偉盛譯，〈荷據時期教會工作史料選譯（五）〉《臺灣文獻》52: 4 (2001 年 12 月)，頁 194-196。

然。⁸² 因此，他決定採取荷語傳教和教學，卻也遭遇到相同的挫折，不僅父母只允許一名孩童學習，且學生僅會背誦，並不了解荷語的單字和句意。⁸³ 馬賽人父母不熱衷將孩子送去學習荷語的現象是否與馬賽人處於「後西班牙殖民時期」有關？除了必須適應不同宗教實踐方式和語言轉換的難度外，馬賽人對荷蘭改革宗教會相對於天主教確實頗有微詞。當西班牙神父 Victorio Riccio 於 1666 年來雞籠時，遇到不少聲稱仍保留十字架和聖像的馬賽天主教徒，為此他聽取他們的告解並為當地孩童受洗。雖然 Riccio 神父不曾記錄西班牙語是否存續，卻認為他們對於「上帝的信仰與西班牙人的愛」表現出「無比的固執與堅持」。⁸⁴

（二）語言採借與命名

西拉雅語羅馬字化的紮根程度清楚地反映在後來的十九世紀仍能書寫，同時留存迄今的〈新港文書〉，其內容主要為房屋、土地買賣或金錢借貸等契約文書，包括〈單語文書〉和與漢字並列的〈雙語文書〉。⁸⁵ 根據目前所知的收藏，現存 170 件文書中大部分為西拉雅語，出自新港社的文書有 135 件。⁸⁶ 此外，〈新港文書〉也包括書寫大武壠語（Taivuan）和馬卡道語（Makatau）的文書，含括臺南、高雄及屏東地區。⁸⁷

值得注意的是，從〈新港文書〉可以觀察到西拉雅語有不少外來借用詞

⁸² Hsin-hui Chiu, *The Colonial 'Civilizing Process' in Dutch Formosa, 1624-1662* (Leiden, Boston: Brill, 2008), pp. 208-209.

⁸³ 關於 Masius 牧師 1657 年的報告，參見林昌華，〈十七世紀中葉荷蘭改革宗教會對北部臺灣原住民的教化：以 Marcus Masius 牧師的淡水與基隆教務報告書為中心而述〉，收於呂理政主編，《帝國相接之界：西班牙時期臺灣相關文獻及圖像論文集》（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2006），頁 179-207。

⁸⁴ John E. Jr. Wills, "The Hazardous Missions of a Dominican: Victorio Riccio, O. P. in Amoy, Taiwan, and Manila. Les missions aventureuses d'un Dominicain, Victorio Riccio," *Actes du IIe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Sinologie: les rapports entre la chine et l'Europe au temps des Lumières* (Sept. 1977), French, pp. 231-243; English, pp. 243-257; Hsin-hui Chiu, *The Colonial 'Civilizing Process' in Dutch Formosa, 1624-1662*, pp. 208-209.

⁸⁵ 吳國聖、翁佳音，〈新港文書研究：典契的解讀與格式〉，收於葉春榮主編，《建構西拉雅：研討會論文集》（臺南：臺南縣政府，2006），頁 97-144。

⁸⁶ 李壬癸編著，《新港文書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2010），頁 2、4。新港社幸運地留下來為數最多的文書，同時也是該社與荷蘭東印度公司具有特殊歷史關連的例證。關於新港社與荷蘭東印度公司，參見康培德，〈紅毛先祖？新港社、荷蘭人的互動歷史與記憶〉，《臺灣史研究》15: 3 (2008 年 9 月)，頁 1-24。

⁸⁷ 李壬癸編著，《新港文書研究》，頁 4。

(loanwords)，例如閩南語和其他南島語，在此僅討論南島語方面的借用詞。〈新港文書〉開頭第一句往往是：*Attaing ta soladt*，即「立約」之意。⁸⁸ 沒有書寫傳統的西拉雅人卻有 *soulat* 一字，意為書寫(writing)，其他的拼法包括 *solat*、*soulat*、*solladt*、*soladt* 等。⁸⁹ *Soulat* 應是源自菲律賓馬尼拉和呂宋島南端一帶他加祿語(Tagalog)的 *sulat*，帶有信件、書信、書寫、備忘錄、證明書等意義。⁹⁰ 東印度公司所在島嶼東南亞的主要語文，包括同屬南島語系的馬來語、印尼語乃至爪哇語，也有類似卻拼寫作 *surat* 的語彙。⁹¹

從西拉雅人在荷蘭拼字教育習得 *soulat* 而非 *surat* 一詞的現象，我們不禁推測西拉雅人乃是透過他加祿語認識 *soulat*，換句話說，*soulat* 並非伴隨以馬來語分布地的島嶼東南亞作為亞洲擴張基地的東印度公司來到臺灣的脈絡而進入西拉雅語。針對這個推測應該如何解釋呢？1633年，尤紐士牧師曾寫信給蒲特曼長官(Hans Putmans)指陳麻豆人已然成為東印度公司權力的障礙，信中提到，最近麻豆人肆意撕毀公司發給華人漁夫在魷港的捕魚執照，騷擾華人、拿走華人的東西，甚至割去其中一名華人的頭髮作為勝利的象徵，還說：「我們要怎麼處理 Tion 的 *Soulatt* 呢？」⁹² *Soulatt* 指的正是捕魚執照。尤紐士牧師義憤填膺，採取生動描述的實例，力陳對麻豆人發動戰爭的理由，成為少數直接記錄「原語」的

⁸⁸ 翁佳音，〈一件單語新港文書的試解〉，《民族學研究所資料彙編》1 (1990)，頁146。

⁸⁹ 關於 *soulat* 的其他拼法，參見李壬癸編著，《新港文書研究》，頁23，註1。

⁹⁰ 南島語言中，尚有 Kagayanen 以及 Bangingi Sama 也同樣以 *sulat* 表達書寫之意，說此兩種語言的族群亦分布於菲律賓，參見 Darrell T. Tryon, et al., eds., *Comparative Austronesian Dictionary: An Introduction to Austronesian Studies Part 4* (Berlin;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995), p. 506. 關於 Tagalog 語的分布地區，可參考網站「Austronesian Basic Vocabulary Database (南島語基本語彙資料庫)」，下載日期：2012年8月31日，網址：<http://language.psy.auckland.ac.nz/austronesian/>。

⁹¹ 參考以下字典：W.G. Shellabear (William Girdlestone), *An English-Malay Dictionary* (Charleston, SC.: BiblioLife, 2012); Alan M. Stevens and A. Ed. Schmidgall-Tellings, *A Comprehensive Indonesian-English Dictionary*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04); Stuart Robson and Singgih Wibisono, *Javanese English Dictionary* (Hong Kong: Periplus Editions; North Clarendon, VT: Tuttle Pub., 2002).

⁹² 原文為「...seggende wat hebben wij met het *Soulatt* van den Tion te doen」，參見 Leonard Blussé, Natalie Everts, and Evelien Frech, eds., *The Formosan Encounter: Notes on Formosa's Aboriginal Society: A Selection of Documents from Dutch Archival Sources. I: 1623-1635* (以下簡稱 *The Formosan Encounter*) (Taipei: Shung Ye Museum of Formosan Aborigines, 1999), pp. 223, 306; 編譯者認為 *Soulatt* 是來自於馬來語。此處「華人」係本文根據時代脈絡與當時的習慣，依循陳第〈東番記〉(1603)將之視為十七世紀時的自稱用詞；清代以後，則稱為漢人。至於語言和文字方面，不分時代均為漢語、漢文，敬請讀者諒察。

文本，反映出當時麻豆人已使用 *soulat*，也相當明白此字具有的文書意涵。

在 C.J. van der Vlis 以荷蘭時代輯錄的西拉雅語編纂出版之〈福爾摩沙語彙表〉中，*soulat*、*saulat* 為書、信之意，動詞則是 *smoulat*，同樣和他加祿語的名詞 *sulat*、動詞的 *sumulat* 相符。⁹³ 更值得注意的是，從〈福爾摩沙語彙表〉的收錄來看，說明荷人已將之視為在地所謂的「新港語」，不難推測其進入西拉雅語言脈絡應早於荷蘭人來到臺灣。筆者曾論述 1582 年從澳門出發，卻在臺灣發生船難的葡萄牙船隻，生還者極可能遇到了西拉雅人，同時，這次船難還可能使西班牙神父從馬尼拉帶來的呂宋隨行男孩，因緣際會地滯留在蕭壠而未能回到澳門。⁹⁴ 根據船難事件報告可知，此男孩當時即能與土著溝通，由於他隨侍神父身旁，對於文書和書寫應不陌生，或許他也是扮演著將 *soulat* 和 *smoulat* 等語彙帶入西拉雅語的關鍵人物。

這裡還可再深究「我們要怎麼處理 *Tion* 的 *Soulatt* 呢？」這句包含原語的引文。目前學界尚未能解答西拉雅人究竟如何指稱荷蘭人。⁹⁵ 從引文來看，*Tion* 指的究竟是發給執照的荷蘭當局？抑或持有該證的華人？確有模糊不清的疑義。筆者認為前者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也就是 *Tion* 與荷蘭當局更為相關。首先，從麻豆人如何理解捕魚執照來思考，臺灣西部沿海自二林至下淡水一帶在冬季正是烏魚盛產期，東印度公司對前來捕魚的中國漁船自 1630 年起，實施每月發給每艘舢舨船一張執照，領取執照時需繳納一里爾（real）的措施。⁹⁶ 對於這項行之有年的政策，與荷蘭人、華人互動頻繁的麻豆人應當不會不清楚。從尤紐士牧師的信中也可判讀出，麻豆人深知華人的捕魚執照來自荷蘭當局的事實。因此，「我們要怎麼處理 *Tion* 的 *Soulatt* 呢？」其實極具挑釁意味。尤紐士牧師在信中援引原語，為的正是利用內含濃厚的挑釁激起荷蘭長官的憤怒，採取征伐麻豆人的實際

⁹³ 此處的福爾摩沙語指「新港語」，西拉雅語。C.J. van der Vlis, “Woorden-lijst der Formosaansche taal, volgens een handschrift in de bibliotheek der Utrechtsche Acaemie aanwezig.” (以下簡稱 *Woorden-lijst der Formosaansche taal*) in *Verhandelingen van het Bataviaasch Genootschap van Kunsten en Wetenschappen* 18 (1842), pp. 458, 482; 另外關於 Tagalog 語，參見 Teresita V. Ramos, *Tagalog Dictionar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71).

⁹⁴ 邱馨慧，〈由原住民史料再論一五八二年臺灣船難地點〉，《臺灣文獻》60: 3 (2009 年 9 月)，頁 25-26。

⁹⁵ 翁佳音，〈新港有個臺灣王：十七世紀東亞國家主權紛爭小插曲〉，《臺灣史研究》15: 2 (2008 年 6 月)，頁 9。固然，現在李壬癸提出麻豆人其實是說大武壠語，並非西拉雅語。參見李壬癸，〈臺南與高屏地區的平埔族語言：兼論麻豆社的地位〉，收於李壬癸編著，《新港文書研究》，頁 631-640。

⁹⁶ 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9），頁 230-231、236。

行動。

臺灣原住民稱呼外來的西方訪客為 *Tion*，在十九世紀尚有例可循。1862年，英國人郇和（Robert Swinhoe）來臺灣後的經歷指出，當時泰雅族人曾稱呼他‘*Tyon*’，他推測這個稱法的可能性之一，來自馬來語 *Tuon*（*sic.*馬來語拼寫為 *Tuan*），意為「先生」（*Sir*）。⁹⁷ 身處山區的泰雅族在荷蘭時代後的200年卻能使用這樣的稱呼，或有更複雜的時空背景。然而，十七世紀的麻豆人若稱呼荷蘭當局為 *Tion*，也就是訛化的 *Tuan*，究竟是在什麼樣的機緣下促成的呢？當地人或許直接或間接聽聞東印度公司中說馬來語的僕役或奴隸稱呼、談論歐洲人時使用了該詞，因而熟悉其用法，進而傳開成為特定用語，這確有史實根據。1623年10月，先行前赴大員、準備興建堡壘事宜的荷蘭艦隊司令官雷爾松（Cornelis Reyersen）和利邦上尉（Elie Ripon）首度遭逢臺灣原住民，他們帶去的人員中，一半以上都是說馬來語方言的班達奴隸，當時他們先與目加溜灣人有所接觸，隨後卻與麻豆人發生爭戰。⁹⁸ 1629年9月，班達奴隸逃離大員，目加溜灣人尚且收留班達奴隸，最後才被迫交給東印度公司。⁹⁹ 換句話說，西拉雅人與東印度公司中說馬來語的奴隸當有許多互動機會。在準備興建堡壘的行動中，曾發生蕭壠人邀請兩位公司商務員前往村落參觀的小插曲。據他們的報告指出，蕭壠人說著一種混雜著外來馬來語和 Talaut 島語的奇怪語言，後者鄰近印尼蘇拉威西的東北端和菲律賓民答那峨島的南方，屬菲律賓語言。報告中也舉出實例，例如 *ikan*（馬來語，「魚」），這在西拉雅語則為 *tging*。¹⁰⁰

⁹⁷ 郇和指出的另一個可能為漢語 *Tajin*，即「大人」（Your Excellency），但是發音並不類似，參見 W.M. Campbell,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p. 554；並請參照 Hsin-hui Chiu, *The Colonial 'Civilizing Process' in Dutch Formosa, 1624-1662*, p. 250。林偉盛譯註此段落時也曾推測：是否表示「公司給中國漁夫的捕魚執照」？詳見包樂史、N. Everts、E. Frech 編，林偉盛譯，《邂逅福爾摩沙：臺灣原住民社會紀實·荷蘭檔案摘要》（臺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2010），第1冊：1623-1635，頁140，註49。

⁹⁸ Leonard Blussé, Natalie Everts, and Evelien Frech, eds., *The Formosan Encounter I*, pp. 23-24；艾利·利邦（Elie Ripon）著、伊弗·紀侯（Yves Giraud）編注、賴慧芸譯，《利邦上尉東印度航海歷險記：一位傭兵的日誌（1617-1627）》（臺北：曹永和文教基金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頁123-124。

⁹⁹ Leonard Blussé, Natalie Everts, and Evelien Frech, eds., *The Formosan Encounter I*, pp. 160, 174, 176.

¹⁰⁰ Leonard Blussé, Natalie Everts, and Evelien Frech, eds., *The Formosan Encounter I*, pp. 18, 24, 305；Hsin-hui Chiu, *The Colonial 'Civilizing Process' in Dutch Formosa, 1624-1662*, p. 246；C.J. van der Vlis, “Woordenlijst der Formosaansche taal,” pp. 468-469.

穿梭來往於東南亞多元語境的荷蘭人初到臺灣時，不僅指出當地人使用一些外來語彙，也能聽出語言使用上的混雜性。雖然所謂「混雜的奇怪語言」，描述的正是當時尚未被確認的馬來語、菲律賓語言及西拉雅語同屬南島語系的相似性，但卻也暗示臺灣原住民與其他南島語族一旦接觸，彼此可以相互溝通的程度，超乎當時歐洲人的理解，兩者互換情報，習得對方不同的語彙，自是不在話下。利邦上尉當時在臺灣已能聽到西拉雅人說馬來話了。若紀錄無誤的話，他提到當地人會向外人兜售肉品，雖然是以動物名稱來表示：“*Chorque baboue, chorque rouca?*”意為「你要買豬肉還是鹿肉？」¹⁰¹「豬」在西拉雅語為 *vavoy*，在馬來語則是 *babi*；「鹿」在西拉雅語為 *gwey*，在馬來語為 *rusa*，此句夾雜著西拉雅和馬來語。

既然西拉雅和馬來人接觸、互動，也學用馬來語，馬來語即以仿廈門音的 *Tiong*（「中」）指涉華人或華人事物，為何麻豆人說的 *Tion* 不是指華人呢？¹⁰² 這或許是因在地緣與歷史機緣下，當地人早就直接與華人接觸，因而有指稱華人的專門用詞，間接來自馬來人或馬來語脈絡的 *Tiong* 被採借的可能性便不大。我們確實看到十八世紀中期前後的〈新港文書〉紀錄了指稱漢人的用詞 *rangatiang*。¹⁰³ 雖不清楚 *rangatiang* 的構詞由來，但已說明西拉雅語確有專詞予以稱呼，推測在荷人尚未來到臺灣的更早以前，西拉雅人和華人接觸後便使用該稱呼，並持續沿用下來。¹⁰⁴

倒是從虎尾壠語，我們看到命名華人的可能語境。相較於研究者必須考證西拉雅語如何指稱荷蘭人與華人，虎尾壠人對兩者的稱法卻至為明確。根據《語典》，前者為 *Bausie*，後者為 *poot*。關於對華人的稱呼“*poot*”，筆者提出此一詞當為閩南語的「布」（*pò*），虎尾壠人極可能在物品交換場合接觸到華人帶來的布等織品，印象深刻之餘，因而轉借「布」稱呼華人。¹⁰⁵ 那麼 *Bausie* 又該如何

¹⁰¹ 艾利·利邦著、伊弗·紀侯編注、賴慧芸譯，《利邦上尉東印度航海歷險記：一位傭兵的日誌（1617-1627）》，頁 125。

¹⁰² The Indonesian Etymological Project, *Loan-Words in Indonesian and Malay*, p. 322.

¹⁰³ 李壬癸編著，《新港文書研究》，頁 27、165、201、209。*Rangatiang* 亦有不同拼寫，如 *Ragatiang*，李壬癸編著，《新港文書研究》，頁 475。筆者查閱該書收錄的麻豆文書，並未發現帶有「漢人」一詞。

¹⁰⁴ 審查人指出今日臺南的西拉雅族仍在使用的 *Rangatiang*，感謝補充說明。

¹⁰⁵ 邱馨慧，〈近代初期臺灣原住民的「消費者革命」〉，收於林玉茹主編，《比較視野下的臺灣商業傳統》（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2），頁 454-455。

解釋呢？Happart 牧師在《語典》中並沒有為「荷蘭人」建立像 *poot* 一樣獨立的詞條，虎尾壠語「荷蘭人」出現在解釋引導疑問句 *ja*，和 *ummadok*（挑選）兩個語彙的例句中，以前者為例說明：

Ja madarram jonoe ta Deos o Bausie ?

Do you know the God of the Dutch ?¹⁰⁶

（中譯：你知道荷蘭人的上帝嗎？）

在虎尾壠語中 *Bausie* 顯然用來指稱「荷蘭人」。¹⁰⁷ 筆者認為 *Bausie* 和《語典》收錄、尾音更短一點的 *pausi* 有直接關係。*Pausi* 為及物動詞，Happart 牧師提示與 *mausi*（白色的）、*posi*（使變白）有關，其中 *osi* 為白色的名詞，*ma-aosi* 與 *mausi/ma-ausi* 也都有「白色的」意義。¹⁰⁸ 若以語言學者李壬癸關於虎尾壠語有聲、無聲及語法功能的說法來看，¹⁰⁹ 名詞時發音為 /b/，動詞時為 /p/，*Bausie* 當為 *pausi* 的名詞式，也具有「白」的意涵。以 *Bausie* 指涉荷蘭人，突顯出虎尾壠人掌握到荷蘭人相對「白」（膚色）為特徵，因而賦予這樣的命名。面對未曾接觸的人事物，臺灣原住民嘗試透過「命名」的方式，在既有認知的世界中予以定位，正是表現出不同的歷史經驗和語言慣常的做法。

（三）閩南語作為通用語

以傳教為目的的學校教育最後因教區縮編的考量，集中於西拉雅語地區，本地福爾摩沙語言（Formosan Languages）也被化約到僅使用西拉雅語一種。¹¹⁰ 位於大員為中心的核心地區以外、北方和南方地區的教會與學校逐漸邊緣化；然

¹⁰⁶ *ummadok* 例句中，拼寫成 *bausje*，參見 W.M. Campbell, *The Articles of Christian Instruction*, pp. 138, 196.

¹⁰⁷ Hsin-hui Chiu, *The Colonial 'Civilizing Process' in Dutch Formosa, 1624-1662*, p. 257.

¹⁰⁸ W.M. Campbell, *The Articles of Christian Instruction*, pp. 158, 172, 178.

¹⁰⁹ 若 *pausi* 與 *Bausie* 僅在於 p（無聲）、b（發音）的差別，李壬癸的研究提出基於荷語對於發音有無的區辨要求，Happart 牧師應該不會對虎尾壠語的相同表現錯誤記音；同時虎尾壠語的發音與否也與文法有關，例如 *babot* 為「鞋」，*pabot* 為「穿鞋」。參見 Paul Jen-Kuei Li, "Notes on Favorlang, an Extinct Formosan Language," in Dah-an Ho and Ovid J. L. Tzeng, eds., *POLA Forver: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Professor William S-Y Wang on His 70th Birthday*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2005), pp. 180-181.

¹¹⁰ 賀安娟，〈荷蘭統治之下的臺灣教會語言學〉，頁 102。

而，南部地區在 1650 年代已然出現西拉雅語化的現象。¹¹¹ 西拉雅語逐漸在傳教和教學政策的助導下，成為被塑造出來的通用語，即使當初普遍認為南部學校教育成效不佳，但此現象若能繼續發展下去，臺灣或許會發生如同前文所討論的安汶一般，通用語馬來語後來取代各地方言，導致方言的消失。這點其實已可從十八世紀到二十世紀上半，各方人士所記錄的西南部和南部平原平埔族語彙趨於「相當接近」，和「大量移借西拉雅語彙」的現象中見其端倪。¹¹²

當然在臺灣並非由西拉雅語，而是後來更為強勢的漢語——閩南語取代西部平原地區的多種福爾摩沙語言。透過華人中介，原住民不僅聽聞閩南語口語，甚至也明白漢字具有的溝通功能，例如在東印度公司征伐虎尾壠前，曾與尤紐士牧師接觸過的當地長老傾向與公司締和，因此知會華人代為通知荷蘭當局，只要荷人出現在該地區，他將帶著追隨的虎尾壠人遁入林子中，並在家屋貼上「漢文字條」，避免荷人攻擊村落時燒毀家園。¹¹³ 漢字能夠扮演這個角色，應與華人在荷人尚未來到臺灣前即與原住民村社發展之關係有關，閩南語也因此成為荷蘭時代的臺灣多元語言現象的重要語言，在各地發揮著力度不等的區域性通用語的功能。

除此之外，各地方言採借的外來語中，大部分經過本地語言訛化語音的作用，在其他原住民語料尚且欠缺不足的情況下，閩南語語彙成為現今研究者最容易判斷的來源。根據〈福爾摩沙語彙表〉和《虎尾壠語典》收錄的西拉雅語和虎尾壠語來看，被採借的外來語通常變成適應當地發音習慣的形式，若本地人容易

¹¹¹ 南部地區的西拉雅語化現象首先由李國銘提出，詳見李國銘，《族群、歷史與祭儀：平埔研究論文集》（臺北：稻鄉出版社，2004）。

¹¹² 李壬癸，〈臺南與高屏地區的平埔族語言：兼論麻豆社的地位〉，頁 639。

¹¹³ 關於此字條，荷蘭檔案分別有兩處指稱相同事例：Johan van der Burch 長官於 1636 年 10 月 5 日以及 Hans Putmans 長官於 1636 年 10 月 7 日，分別致總督 Anthonio van Diemen 的信件，後者為原件。前信註明：「他將在他家門上留下用中文寫的字條」（soo wilde dan een briefken, in Chinesee taele geschreven, aen zijn deur placken）；後信則是「他將會在其族人的房子黏上中文小紙條」（hij zijne huysen met Chinesee papiertjes zoude lateen beplacken），資料出處參見 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The Formosan Encounter. Notes on Formosa's Aboriginal Society: A Selection of Documents from Dutch Archival Sources. II: 1636-1645* (Taipei: Shung Ye Museum of Formosan Aborigines, 2000), pp. 108, 112, 118, 124。中譯本參見包樂史、N. Everts 編，康培德譯，《邂逅福爾摩沙：臺灣原住民社會紀實·荷蘭檔案摘要》（臺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2010），第 2 冊：1636-1645，頁 65、70；J.L. Blussé, M.E. van Opstall, Yung-ho Ts'ao, Shu-sheng Chiang, and W. Milde,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1629-1662, DEEL I: 1629-1641* (Den Haag, Nederland: 's-Gravenhage verkrijgbaar bij martinus Nijhoff: Bureau der Rijkscommissie voor Vaderlandse Geschiedenis, 's-Gravenhage, 1986)；中譯本參見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臺南：臺南市政府，1999），第 1 冊，H fo. 450。

發音，也不乏直接模仿外來語的發音，其中包括與華人有關的物品，或與華人溝通所需的語彙等。以西拉雅語為例，緞為 *touang*，糖為 *camsia*（甘蔗）等。¹¹⁴ 有趣的是，《虎尾壠語典》紀錄 *summamgean* 及其相關詞 *samgean*，Happart 牧師註明此字：原先為漢語（a Chinese word），被虎尾壠人採用後變成上述的樣子，意為奉獻（to offer, offering），此處的奉獻具有向神供物的祭儀意思。¹¹⁵ 或許虎尾壠地區不僅衣著類似華人，從 David Wright 對福爾摩沙華人宗教情況的紀錄來看，虎尾壠人對華人宗教活動應不陌生。¹¹⁶ 《語典》中，Happart 牧師也收錄他懷疑是漢語的 *tonso*，意為祖國。¹¹⁷ 有趣的是，即使 Happart 未提到來自漢語，根據閩南語對音，似乎也能推測是從漢語採借而來。例如《語典》指稱 *matsiole* 為娛樂、遊戲（to game, to play），附註「如同華人所為」，也許即「麻將」；另外，*taugo*（頭果）指稱一種圓錐形水果，應是荷蘭時代從爪哇引進臺灣，俗稱「佛頭果」的釋迦，《語典》的收錄讓我們知道，至少在 1650 年代原生美洲西印度群島的釋迦已在臺灣出現了。¹¹⁸

閩南語在荷蘭時代的臺灣，尤其是本地原住民當中，一直維持著具有實質溝通效用、卻至為低調的地位。在地方會議進行的政令宣示，和藉由禮物贈與賦予威權的儀式中，西拉雅語、虎尾壠語、山區語言、大木連語、排灣語、卑南語等皆是宣讀的語言，閩南語在其間從來不具發聲地位，甚至東印度公司在出席的村落長老面前，刻意安排華人代表向荷蘭當局致意並獻上中國茶點的橋段，華人臣屬意味十足。¹¹⁹ 然而，值得玩味的是，西拉雅語稱呼荷蘭長官，也就是所有歐

¹¹⁴ C.J. van der Vlis, "Woorden-lijst der Formosaansche taal," p. 465.

¹¹⁵ W.M. Campbell, *The Articles of Christian Instruction*, p. 185; 收錄相關的字包括: *samgeanna*, *samgeannen*, *sinamgean*。在此，感謝審查人指出其與宗教祭儀相關。

¹¹⁶ 虎尾壠地區原住民衣著比較像華人，參見 W.M. Campbell,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p. 256; 邱馨慧，〈近代初期臺灣原住民的「消費者革命」〉，頁 469；葉春榮編譯，〈初探福爾摩沙：荷蘭筆記〉（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11），頁 174-198。

¹¹⁷ W.M. Campbell, *The Articles of Christian Instruction*, pp. 113, 189.

¹¹⁸ W.M. Campbell, *The Articles of Christian Instruction*, p.157；潘富俊，〈福爾摩沙植物記：101 種臺灣植物文化圖鑑&27 則臺灣植物文化議題〉（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頁 148。「佛頭果」少了「佛」的掉音現象，或可佐證林昌華提出的說法：虎尾壠語缺乏 F 和 V 的發音方式。參見林昌華，〈追尋華武壘：以荷蘭文獻重構華武壘 (Favorlang) 民族誌〉，《臺灣教育史研究會通訊》63 (2009 年 11 月)，「賴永祥長老史料庫」，下載日期：2011 年 1 月 22 日，網址：<http://www.laijohn.com/PCD-F/research/Lim,Choa.htm>：四、2、華武壘人的身分認同。

¹¹⁹ 參見 1644 年地方會議紀錄，J.L. Blussé, W.E. Milde, Yung-ho Ts'ao, and N.C.Everts, eds., *Dagregisters*

洲人 (*Tuan*) 中最高位者，卻是轉借閩南語的「王」(*ong*)，稱呼荷蘭本國最高權力者 (Stadholder) 則是「皇帝」(*honte*)。¹²⁰ 雖然臺灣原住民難以得見「皇帝」，卻可能在熱蘭遮城長官官舍內見過懸掛於牆面，奧倫治親王列位諸公的畫像，這無疑有助於在原住民之間營造皇室尊貴和「遙不可及」的威權威感。¹²¹

東印度公司失去臺灣後，閩南語一躍成為檯面上的語言，各地原住民在複雜的政、經因素下逐漸習慣說閩南語，原來的母語失去昔日的優勢。1873年，美國自然史學家史蒂瑞 (Joseph Steere) 描述「平埔番」(Pepo-whans) 已不再說自己的語言了，取而代之的是說漢語 (閩南語)。他探訪西拉雅的移住村落——崗仔林，當地老婦人坦言自己父母親一輩已很少說原來的話了，閩南語早就很普遍，最後他只從老婦人處獲得 147 個字的詞彙表。¹²² 這些詞彙或因是基本詞彙之故，仍為西拉雅語，並未發現荷語。¹²³

李壬癸根據史蒂瑞在 1873 年只能採錄到單詞而非語句的事證，和現存〈新港文書〉紀錄遲至 1818 年，推測西拉雅語大約在 1830 年左右便已成為死語，包括「書寫系統的斷絕」。¹²⁴ 在此值得提出的是，「書寫系統的斷絕」之前應當經歷過荷蘭時代結束後一度受到忽視、卻又再度興起的「後殖民書寫時期」，即西拉雅人在經歷後荷蘭殖民時期的社會和經濟生活的變動下，基於需求，激發主動傳承的動力。此外，清朝政府對「教冊」豁免一定額度的餉稅甚至勞役，這類政策誘因也有助於「教冊」成為社會認可的職業，因此透過〈新港文書〉，學者觀

Zeelandia II；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 2 冊，E fo.282、286、294v。

¹²⁰ C.J. van der Vlis, "Woorden-lijst der Formosaansche taal," p. 461.

¹²¹ 1640 年代至少有 14 幅畫像屬於奧倫治皇室 (The House of Orange)，參見 Kees Zandvliet, "Art and Cartography in the VOC Governor's House in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aiwan: The Representation, Interpretation and Identity of Taiwan* (Taipei: National Culture Association and the Taiw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May 29-30, 2006), pp. 77-78.

¹²² J.B. Steere, "The Aborigines of Formosa," in Hsiu-Jung Chang, ed., *A Chronology of 19th Century Writings on FORMOSA: From The Chinese Repository,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The China Review* (以下簡稱 *A Chronology of 19th Century Writings on FORMOSA*) (Taipei: Ts'ao Yung-ho Foundation for culture and education, 2008), pp. 455、457-459；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臺灣：十四位西方旅行者的福爾摩沙故事》(臺北：如果出版社，2006)，頁 74、105。

¹²³ 包括稱呼、身體、天體、自然物、方位、數字、色彩、基本的形容詞、副詞以及動詞等。

¹²⁴ 李壬癸，〈新發現十五件新港文書的初步解讀〉，《臺灣史研究》9:2 (2002 年 12 月)，頁 5；李壬癸編著，《新港文書研究》，頁 1。

察到有不同的書寫傳統正在形成和發展的趨勢。¹²⁵ 「書寫系統的斷絕」或可視為被殖民歷史過程中兩股潮流（trends）拉鋸戰的結果：一方代表延續昔日荷蘭書寫教育以存續西拉雅語，乃至西拉雅語所承載、不同來源外來語的既有實踐；另一方則是逐漸深入日常生活的新勢力，包括口說閩南語、書寫漢文及閱讀漢文的能力和習慣的形成與教養。一旦後者藉由制度穩固發展，新世代熟悉漢語、文之後，書寫系統才可能因不再需要而漸次棄用、不傳。

語言接觸研究指出，語言經由接觸導致的改變包括兩種類型：採借（borrowing）和底層干擾（substratum interference），後者標示著語言改變的過程：語言操持者逐漸採用其他語言，放棄自己語言的過程。「文書」的形式往往涉及採借較具優勢語言在結構層次上的句法（syntactic），因此便不僅是語彙的採借（lexical borrowing），進一步觸及底層干擾的範疇了。¹²⁶ 換句話說，〈新港文書〉或可視為西拉雅語經歷底層干擾過程的例證，呈現出來的不僅是採借大量的閩南語語彙，應還包括閩南語結構性的句法或文法的採借，當然這部分尚需相關語言專業的研究。¹²⁷ 大體而言，西拉雅語的消失最後經歷了書寫和口說兩方面無法存續的困境，可以言說、溝通的語言只剩下零散、密碼似的語彙。

（四）荷蘭語的歷史遺緒

在此，筆者也想探討一下荷語在臺灣消失的問題。荷語是否在荷蘭時代結束後仍然有存續的可能？目前已出版〈新港文書〉的相關研究，尚未舉出文書中出現過書寫荷語的例證。¹²⁸ 然而，郇和在 1863 年宣讀的論文〈福爾摩沙民族學記事〉卻提到當時新港社保留的羅馬字文件，「偶而會有個荷蘭詞出現，或這裡那裡有個數字。荷蘭在廈門的領事 De Grijs 試圖辨認，但完全沒辦法。」¹²⁹ 似乎

¹²⁵ 吳國聖、翁佳音，〈新港文書研究：典契的解讀與格式〉，頁 94。

¹²⁶ Sarah Grey Thomason and Terrence Kaufman, *Language Contact, Creolization, and Genetic Linguis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p. 21, 66, 78.

¹²⁷ 目前語言學者對〈新港文書〉的研究似乎著重於音韻與詞彙方面，參見李壬癸編著，〈新港文書研究〉，頁 xiii-xviii；而歷史學者對〈新港文書〉的研究則關注格式和語音，特別是異於漢式的族群與社會特色，參見吳國聖、翁佳音，〈新港文書研究：典契的解讀與格式〉，頁 92-106。

¹²⁸ 筆者參考的主要研究包括吳國聖、翁佳音，〈新港文書研究：典契的解讀與格式〉；李壬癸，〈新發現十五件新港文書的初步解讀〉；李壬癸編著，〈新港文書研究〉。

¹²⁹ 參見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臺灣：十四位西方旅行者的福爾摩沙故事〉，頁 34。

又透露出仍有些微的可能性。荷語或許同樣經歷了西拉雅語消失的過程，只是過程可能更快且更早為西拉雅人所棄用，但荷語是否也有零星的詞彙，類似虎尾壠語訛化閩南語的例子，曾留駐在西拉雅語彙中，後來才隨之消逝而一併消失？以現存西拉雅語彙記錄來看，荷蘭人的職稱用語倒是被西拉雅人採借成當時習慣的語彙，例如〈福爾摩沙語彙表〉收錄的 *capitang*，即是「上尉」（現今荷語為 *kapitein*）。¹³⁰

雖然在季風亞洲，*capitang* 一詞更可能源自葡萄牙語 *capitão*，即習稱的「甲必丹」。¹³¹ 但對臺灣原住民來說，*capitang* 被採借、訛化，甚至附以權貴的色彩，或許是因處在東印度公司帶來的被殖民情境下，必須特別關注權力者的結果，直接引借「職稱」的外來語成為保險的生存之道。¹³² 在臺灣中、南部地區仍有其他相似的採借例證可以說明是來自與東印度公司互動下的產物。虎尾壠人也熟習此詞，《語典》*rummauch* 詞條收錄下面的例句：

ta Albert iparauch o raro ta captain ja sisjim,

The Children are charged by Albert to uncover the head before the captains.¹³³

(中譯：Albert 讓孩子們在官員們面前，把帽子拿開不要遮住頭。)¹³⁴

這樣的場合應該是當地孩童被教導面見東印度公司人員「上尉」時的禮儀；此外，荷蘭當局也用「上尉」稱呼原住民村落的長老，特別是參加地方會議的村落代表們。¹³⁵ 原住民在與荷蘭人的互動中，顯然已經意會到「上尉」在位階上的高度。

從荷蘭文獻中可以觀察到南臺灣的排灣人在與荷蘭人接觸之前，便已發展出具有貴族／平民身分差別的階序社會。1636年，瑯嶠地區排灣人的貴族之首（荷蘭人當時稱為 *vorst*，「君主」之意）——Tartar 即加入 Johan van Linga 上尉率領的荷蘭軍隊，共同組成聯軍前往卑南地區，其最小兒子的名字便是訛化的

¹³⁰ C.J. van der Vliet, "Woorden-lijst der Formosaansche taal," p. 461.

¹³¹ 此處加上葡萄牙語源的考慮與解釋，感謝審查人的提醒。

¹³² 荷文檔案的 *kapitein* 用法可查找「VOC glossarium」網站，下載日期：2012年8月23日，網址：<http://www.historici.nl/Onderzoek/Projecten/VocGlossarium>。

¹³³ W.M. Campbell, *The Articles of Christian Instruction*, p. 180.

¹³⁴ *Raro* 實指帽子，W.M. Campbell, *The Articles of Christian Instruction*, p. 179.

¹³⁵ 翁佳音，〈新港有個臺灣王：十七世紀東亞國家主權紛爭小插曲〉，頁5。

Cappitam。¹³⁶ 顯而易見，「上尉」已被列入貴族階層的名庫，成為當時頗具威望和名氣（prestige）的名字。除此之外，當代的田野紀錄顯示，日本殖民臺灣時期，東部排灣貴族曾將世代珍藏，獲自荷蘭時代地方會議、鑲有東印度公司銀質徽章的權杖，獻給 1923 年出巡臺灣的裕仁皇太子。¹³⁷ 作為排灣階序社會菁英的貴族（*mamazangilan*）充分展現出與異文化接觸過程中，擁有採借和壟斷外來語言、乃至物品的特權。排灣的社會文化機制是否也暗示荷語在排灣語存續的可能性？若荷蘭當局的傳教和教育能在排灣語區開展的話，荷語挾其殖民者語言的優勢或將取得較西拉雅語區的實施更為顯著的成功。然而，這樣的歷史機緣卻不曾發生，即使在瑯嶠地區，荷蘭當局也從未設立學校。¹³⁸ 然而，我們仍可發現以下的例子。

荷語或訛化的荷語在臺灣連續殖民歷史過程中，確實沉澱在語言「層位」中，成為臺灣文化的元素之一。首先，東印度公司從巴達維亞引進臺灣，曾經也是羅馬時代管理異民族方式的承包租稅制度（*verpachting*），主要以華人為投標者，投標價最高者由當局賦予特許權利，涉及原住民生活和在地資源的部分，包括村落包稅（贖社）和淡水與沿海漁業（贖港）。¹³⁹ 江樹生和翁佳音均指出其中「贖」來自荷語的 *pacht*，即為標租之意。¹⁴⁰

南臺灣平原地區以「贖」表示承包，連同語音、概念也出現在山地的排灣語中。當時排灣語區雖僅有瑯嶠實行贖社，但在大武山地區的排灣語也有著稱為“*pa*”，專指與平地人之間的租稅或權利，包括土地、水源的使用權，或准許通行與之進行交換等。頭目家若將土地、水源租給平地人，平地人理當在固定時節將酒、錢、布等禮物送至頭目家，這在排灣族的觀念裡，便如同平民在頭目的土地

¹³⁶ Hsin-hui Chiu, *The Colonial 'Civilizing Process' in Dutch Formosa, 1624-1662*, pp. 75, 96, 263.

¹³⁷ Inez de Beauclair, "Dutch Beads on Formosa? An Ethnohistorical Note,"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29 (1970), p. 388.

¹³⁸ 查忻，〈荷蘭改革宗教會在十七世紀臺灣的發展〉，頁 121。

¹³⁹ 中村孝志著，吳密察、翁佳音、許賢瑤編，〈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2002），上卷：概說、產業，頁 259-261、265-281、292-298。

¹⁴⁰ 江樹生，〈梅花鹿與臺灣早期歷史關係之研究（續）〉，收於內政部營建署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主辦、王穎主持，〈臺灣梅花鹿復育之研究七十四年度報告〉（屏東：內政部營建署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1987），頁 8；翁佳音，〈地方會議、贖社與王田：臺灣近代初期史研究筆記（一）〉，《臺灣文獻》51:3（2000 年 9 月），頁 267。

和森林裡進行耕種與狩獵活動有所得後，必須給頭目家“*kazelu*”與“*vadis*”的習慣相同，貴族收取平地人為此應給的禮物，即稱為“*ki-pa*”。¹⁴¹ 因此，“*pa*”除了可能經由瑯嶠地區排灣人進入排灣語區外，也可能透過平地人的脈絡進入其他地區的排灣社會。排灣貴族基於階序社會原有的習慣，輕易便能接納來自平原，經歷荷蘭出贖制度的人群為獲得涉及山上的權利而引介的「贖」。

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制度層面也都可能從荷蘭時代沿襲了下來。劉序楓討論近代華南傳統社會中的「公司」型態時，提到臺灣西南部沿海尚有稱為「寫溪位（會）」的捕撈制度。嘉南平原的溪流包括出海口為魚蝦蟹類迴游區，溪流兩岸村庄為避免紛爭，透過兩岸的庄廟每年定期主辦給庄民投標，由最高價的投標者取得該溪河一年的捕撈權——「贖溪」，其他庄民不得任意下網，標金由庄廟平分作為廟的公產。有趣的是，此時當地人不稱庄廟為廟，而稱「公司」。¹⁴² 很顯然的，「寫溪位（會）」捕撈制度具有的承包內涵，似乎正是荷蘭時代出贖河川、溪流、沿海漁場等「贖港」的翻版，只是主辦者由庄廟取代東印度公司當局。或許在臺灣以類似承包進行權利讓渡和增加公產的活動與運作，必須考慮到荷蘭時代被殖民的歷史經驗，這正是臺灣因而發展出來異於大陸地區移民祖居地的獨特性。¹⁴³

除此之外，〈福爾摩沙語彙表〉也收錄語意為「僕役」的 *congsia*（「公司仔」）一詞。¹⁴⁴ 近代初期，巴達維亞當地華人或貿易史文獻，均將東印度公司（*compangie*）音譯為「公班衙」，「公司」的譯法約見於十八世紀末。¹⁴⁵ 翁佳音認為 *congsia* 與傳統漢人社會制度之一「公司」有關。¹⁴⁶ 果若如此，根據上述劉序楓的研究，目前已知最早的海外貿易相關「公司」史料為 1667 年鄭氏官商船

¹⁴¹ 此處的「*pa*」更應該表記為「*pa?*」。詳見邱馨慧，〈家、物與階序：以一個排灣社會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頁 97，註 62。

¹⁴² 劉序楓，〈近代華南傳統社會中「公司」型態再考：由海上貿易到地方社會〉，收於林玉茹主編，《比較視野下的臺灣商業傳統》（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2），頁 258-259。

¹⁴³ 劉序楓認為臺灣傳統農漁社會村廟使用「公司」一詞的習俗應源於東南沿海福建、廣東等地，雖然除臺灣地區外，尚未見有相關研究。參見劉序楓，〈近代華南傳統社會中「公司」型態再考：由海上貿易到地方社會〉，頁 258。

¹⁴⁴ 另外拼寫成 *congsie*，參見 C.J. van der Vlis, “Woorden-lijst der Formosaansche taal,” p. 461.

¹⁴⁵ 翁佳音，《大臺北古地圖考釋》（臺北：臺北縣立文化中心，1998），頁 92；陳國棟，〈從四個馬來詞彙看中國與東南亞的互動：Abang, Kiwi, Kongsu 與 Wangkang〉，收於陳國棟，《東亞海域一千年》（臺北：曹永和文教基金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頁 127-162。

¹⁴⁶ 翁佳音，《大臺北古地圖考釋》，頁 92。

隻遭遇風災，漂流到朝鮮濟州島後，在官商供述的貨物詳情中提及「非公司之物」。¹⁴⁷「公司」當屬華人社會尋常的組織運作方式。荷蘭檔案確實出現 *congsia*，可見亦為當局所接受的用語，大致指華人，包括賈商手下以及農夫。¹⁴⁸〈福爾摩沙語彙表〉也收錄「士兵」（*congsia kamelalto*），字面意涵涉及僕役和火繩槍（*lalto*），可能為「拿著火繩槍的僕役」，指的是東印度公司的士兵，因此不限於華人。¹⁴⁹或許西拉雅語也和荷蘭當局一般，直接採借閩南語指稱「公司人員」的語彙「公司仔」；這似乎透露了當時來到臺灣的華人工作者，不管從物品交換或土地開發等，均可能經由巴達維亞的華人社會、類似公司組織的轉介而來，其中與荷蘭當局具有良好關係的華人僑領更扮演重要的角色，例如巴達維亞的甲必丹蘇鳴崗（Bencon）甚至代為招募華人，從中國前來臺灣進行開墾。¹⁵⁰

透過制度採借沿襲的荷語，除了「賈」之外，可能還有更多曾在教會活動使用的語彙，雖然可能在荷人離去後仍保留在口語的表達上，但因教會活動已不再持續，同時也沒有像〈新港文書〉一般，藉由地方社會原有相應的管道，特別是具有現實重要性、攸關生活和生存權益的機制得以留存下來，所以也就隨著歷史而消逝。類似這樣可能僅用於口語而未被書寫下來的，自然也不僅限於傳教相關的語彙。

（五）「全款」的認知

討論至此，如同荷蘭時代即將結束前，雞籠馬賽人因西班牙神父的再度造訪而揭開對天主教和西班牙人封存的記憶，十九世紀中期以後，臺灣原住民的「荷蘭經驗」卻在歷史轉折之際再度被觸及。由於戰敗，清廷於 1858 年和 1860 年分別與西方強權簽訂〈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臺灣被迫開港，西方人再度到

¹⁴⁷ 劉序楓，〈近代華南傳統社會中「公司」型態再考：由海上貿易到地方社會〉，頁 232。

¹⁴⁸ 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The Formosan Encounte. Notes on Formosa's Aboriginal Society: A Selection of Documents from Dutch Archival Sources. III: 1646-1654* (Taipei: Shung Ye Museum of Formosan Aborigines, 2006), pp. 313, 345, 412, 446, 548, 558.

¹⁴⁹ 由於荷蘭當局防範火器流入原住民社會並嚴令禁止教其使用，因此排除原住民士兵的可能。火器禁令參見韓家寶、鄭維中譯著，王興安編校，〈荷蘭時代臺灣告令集、婚姻與洗禮登錄簿〉，頁 158。

¹⁵⁰ 關於蘇鳴崗，詳見 Bernard Hoetink, "So Bing Kong, het Eerste Hoofd der Chineezen te Batavia, 1619-1636." [So Bing Kong, the first head of the Chinese in Batavia, 1619-1636.] *Bijdragen tot de Taal-, Land-, en volkenkunde (BKI)* 73 (1917), pp. 344-415.

來。當時漢人稱西方人為「番」，正如同平埔人也被稱為「番」，基於同為「番」的一族，這些來到臺灣的外來訪客普遍感受到平埔人對他們的親切與好客。然而，平埔人將西方人視為「同族番親」，卻不只是出於同處漢人族群分類範疇引發的憐惜和認同感，而是憑藉著血緣連結、傳說及物質遺留等沉澱在被殖民歷史經驗中更為深沉的主觀期待。

外來西方訪客紀錄的文本包括西拉雅人宣稱為荷蘭的後裔；每逢飢荒和災疫發生，西拉雅人會於日落時分在傳說是荷蘭人建造的土丘上，面朝西，捶胸期待舊人歸來的行事；保留與荷人有關的遺物，例如鑰匙、荷蘭陶器碎片，及可能原屬荷蘭傳教士的白法衣等。¹⁵¹ 蘇格蘭醫師萬巴德（Dr. Patrick Manson, 1865-1871 在臺）認知到平埔人視他們為「同族」——當中許多人相信，我們的語言等同已被他們遺忘的語言。1873 年出版的回憶文章裡，他提到曾前往一個當時歐洲人尚未拜訪過的平埔（馬卡道）村落，並與當地老婦人進行歷史性的會面：

我們坐下來不久後，一位眼盲、灰白頭髮又十分孱弱的老婦人被護持到我們坐的地方，開始跟我們說一種我們聽不懂的話。她是過去的遺跡，說著她孩提時候的話，古老的平埔話。看來她很失望，圍觀者也是一樣。「不」，她說，用漢語說，「不，我們無全」。¹⁵²

萬巴德醫師並未說明，可能也難以判斷老婦人說的是單詞或句子，但認為應是孩提時候說的話語。類似的情形，馬雅各醫師（Dr. James L. Maxwell, 1836-1921, 1864-1871、1884 在臺）也遇過。根據史蒂瑞的報導，馬醫師初次拜訪「平埔番」（西拉雅人），「一位老人走上前來，並用古老的語言與他交談，當他無法了解時，

¹⁵¹ 康培德，〈紅毛先祖？新港社、荷蘭人的互動歷史與記憶〉，頁 2-3；W.M. Campbell,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pp. 547, 551；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臺灣：十四位西方旅行者的福爾摩沙故事〉，頁 34。

¹⁵² 筆者自行翻譯。此處的漢語（Chinese），當指閩南語，所以將回答譯為「無全」（*bô-kāng*），參見「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線上版，下載日期：2012 年 8 月 23 日，網址：http://twblg.dict.edu.tw/holodict_new/index.html。當時 Manson 醫生署名「一位前居留者」，參見 Patrick Manson (A Former Resident), "A Gossip about Formosa," in Hsiu-Jung Chang, ed., *A Chronology of 19th Century Writings on FORMOSA*, p. 436；根據文章的行文，雖然此段紀錄列在又開旅程的話題中，但可看出所談大致是屏東地區的族群，文中所謂平埔（Pepos）該為馬卡道人。中譯全文參見劉克襄，〈西方人在打狗的休閒生活〉，收於劉克襄譯著，〈後山探險：十九世紀外國人在臺灣東海岸的旅行〉（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2），頁 144-164。

老人顯得非常失望，看來村人似乎都相信他們古老的語言與渡海來臺的白人訪客說的話都是一樣的（the same）。¹⁵³ 這些會面的結果之所以令人失望，在於口語的語言成為確認「番親」的唯一關鍵，當醫生們表示聽不懂時，眾人失望的背後更有失落感。

處於荷蘭時代逝去的「後殖民情境」和交疊當下「漢人殖民情境」的窘迫與無奈時，平埔人面對視同荷蘭人的西方訪客時，將兩百年前的歷史經驗和記憶轉化成「美好過去」的印象，「原荷連結」（Formosan-Dutch connection）得以進一步強化，同時藉由「同族」的親屬語彙（kinship idiom）表達出來。¹⁵⁴ 然而，更重要的是，與荷人相關的血緣連結、物質遺留及傳說，其實都在後荷蘭殖民情境中成為傳遞此一「親類」（relatedness）的媒介；但是，為何南部平埔人主觀地認定與西方訪客有著相同的語言，口語成為最後驗證「全款」（kāng-khuán）的根據呢？這也是我們必須回過頭來重新審視十七世紀臺灣原住民學習荷語的經驗和成果，以理解語言在此歷史現象中具有的關鍵性意義。

對於受過東印度公司學校教育的平埔後裔來說，特別是〈新港文書〉的書寫者——西拉雅人和馬卡道人，形塑「全款」的記憶和認同過程中，以鵝毛筆書寫羅馬字母可能是最具荷蘭特質（Dutchness）的實踐活動之一。十九世紀中期以前「書寫系統的斷絕」，語言取代文字成為他們認定能重新與「荷蘭人」建立連結的憑藉。即使當時僅剩單詞，西拉雅人卻認為他們過去的語言和視同荷蘭人的西方訪客所說的話應是相同的。換句話說，隨著時光嬗移和漢語強勢壓境，當時受荷蘭學校教育學生的後裔已無法再區分昔日的母語或荷語，因為這些均已成為過去父、祖輩所講的「原來的話」了。我們姑且想像一下，也許在那樣「尋親」的場合，荷語單詞、甚至是訛化的荷語真的成為驗證「番親」的「通關密語」。然而是否真有荷語其實也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那種「全款」的認知對這些平埔人來說，確實具有存在的真實性（reality），且伴隨他們渡過漫長的兩個世紀之久，透露出連續殖民歷史過程中原住民主觀卻至為真切的歷史感受。

¹⁵³ 參見 Joseph Beal Steere, *Formosa and Its Inhabitants*, ed., Paul Jen-kuei Li (Taipei: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Preparatory Office, Academia Sinica, 2002), p. 78.

¹⁵⁴ Hsin-hui Chiu, *The Colonial 'Civilizing Process' in Dutch Formosa, 1624-1662*, p. 226.

五、結論

十七、十八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亞洲的擴張和貿易活動中，不僅在島嶼東南亞和錫蘭進行殖民統治，且在殖民建構的過程中引介荷語成為殖民地官方語言。然而，因各個地區原有分歧且多元，同時也有通用語的語言現象，包括馬來語和後來出現的混合型葡萄牙語，都使得實際推廣的成果不如當局的預期。荷語最終無法成為亞洲殖民地地區的通用語，其實也涉及非語言性質的殖民與後殖民脈絡種種因素。反觀在荷蘭東印度公司僅能設立商館以維持商業機能的日本，最後卻由日方積極培養荷語人才，並開展出引進蘭學的荷語學習和傳承，也為後來日本面臨開國壓力，學習其他外語奠下基礎。

如同語言分歧的島嶼東南亞一般，在荷蘭人到來以前，臺灣原住民雖然也接觸、採借菲律賓的他加祿語，甚至是來自更南端的馬來語，卻尚未發展出類似島嶼東南亞具有的大範圍區域性的通用語。因此，荷蘭東印度公司針對臺灣原住民的荷語教育，成效相對顯著。西南部平原的西拉雅人成為在地語言羅馬字化和荷語教育耕耘力度最大的繼受者，西拉雅語也一度具備發展成地區通用語的潛力和可能性。閩南語在荷蘭時代雖具實質作用，卻非荷蘭當局意欲扶植的溝通媒介，反而因持續在原住民生活發揮功用而為原住民語言所採借。西南部和南部地區羅馬字拼字與書寫教育的成果，日後在閩南語成為強勢語言的時代，同樣基於需求，轉而成為當地原住民用來保障自己權益的書寫工具，也因此留下不同來源的外來語，直到漢語和漢文的閱讀與書寫取代既有以羅馬字書寫母語的實踐。

十九世紀中期以後，臺灣原住民與西方訪客再次遭逢時，「荷蘭經驗」再度從記憶中鮮明起來。身處漢人強勢主導的後荷蘭殖民時代，過去受荷蘭學校教育學生的後裔，特別是西拉雅人和馬卡道人認為他們逝去的語言，與視同荷蘭人的西方訪客所說的應該是相同的話，這樣「當地所思所感」也被後者記錄下來，成為臺灣旅行觀察的片段。經過兩百年歷史的過往，語言終究超越血緣、傳說及具體的物質遺留，成為期盼和過去、故人連結的關鍵「密碼」，更顯示出荷蘭時代語言現象和其遺緒，在在是臺灣連續殖民歷史過程中不可忽略的面向。

引用書目

- 「Austronesian Basic Vocabulary Database (南島語基本語彙資料庫)」, 下載日期: 2012年8月31日, 網址: <http://language.psy.auckland.ac.nz/astronesian/>。
- 「Dutch Language」, 下載日期: 2012年8月31日, 網址: <http://www.dutchlanguage.info>。
- 「VOC glossarium」, 下載日期: 2012年8月23日, 網址: <http://www.historici.nl/Onderzoek/Projecten/VocGlossarium>。
- 「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 下載日期: 2012年8月23日, 網址: http://twblg.dict.edu.tw/holodict_new/index.html。
- C.R. Groeneboer (1994年3月18日), 〈The Dutch Colonial Language Policy〉, 「IIASNEWS」, 下載日期: 2012年8月31日, 網址: <http://www.iias.nl/iiasn/iiasn3/iiasnews/dutch.txt>。
- Hendrik M. Maier (2005年2月8日), 〈A Hidden Language: Dutch in Indonesia〉, 「eScholarship,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下載日期: 2012年8月31日, 網址: <http://escholarship.org/uc/item/2cg0m6cq>。
- 「Rijksmuseum (荷蘭王家博物館)」, 下載日期: 2012年8月23日, 網址: <https://www.rijksmuseum.nl/en/search/objecten?q=spiegel+der+schrijfkonste&p=1&ps=12#/RP-P-1964-2114.0>。
- 林昌華, 〈追尋華武壘: 以荷蘭文獻重構華武壘 (Favorlang) 民族誌〉, 《臺灣教育史研究會通訊》63 (2009年11月), 「賴永祥長老史料庫」, 下載日期: 2011年1月22日, 網址: <http://www.laijohn.com/PCD-F/research/Lim,Choa.htm>。
- 中村孝志 (著), 吳密察、翁佳音、許賢瑤 (編)
2002 《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 上卷: 概說、產業。臺北: 稻鄉出版社。
- 片桐一男 Katagiri Kazuo
2006 《未刊蘭學資料の書誌的研究2》。東京: ゆまに書房。
- 包樂史、N. Everts (編), 康培德 (譯)
2010 《邂逅福爾摩沙: 臺灣原住民社會紀實·荷蘭檔案摘要》, 第2冊: 1636-1645。臺北: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
- 包樂史、N. Everts、E. Frech (編), 林偉盛 (譯)
2010 《邂逅福爾摩沙: 臺灣原住民社會紀實·荷蘭檔案摘要》, 第1冊: 1623-1635。臺北: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
- 尼古拉斯·奧斯特勒 (Nicholas Ostler) (著)、章璐等 (譯)、維舟 (校)
2011 《語言帝國: 世界語言史》。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江樹生
1987 〈梅花鹿與臺灣早期歷史關係之研究 (續)〉, 收於內政部營建署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主辦、王穎主持, 《臺灣梅花鹿復育之研究七十四年度報告》, 頁2-24。屏東: 內政部營建署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 江樹生 (譯註)
1999、2002、2004 《熱蘭遮城日誌》, 第1-3冊。臺南: 臺南市政府。

- 艾利·利邦 (Elie Ripon) (著)、伊弗·紀侯 (Yves Giraud) (編注)、賴慧芸 (譯)
2012 《利邦上尉東印度航海歷險記：一位傭兵的日誌 (1617-1627)》。臺北：曹永和文教基金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吳國聖、翁佳音
2006 〈新港文書研究：典契的解讀與格式〉，收於葉春榮主編，《建構西拉雅：研討會論文集》，頁 97-144。臺南：臺南縣政府。
- 李壬癸
2002 〈新發現十五件新港文書的初步解讀〉，《臺灣史研究》9(2): 1-68。
2010 〈臺南與高屏地區的平埔族語言：兼論麻豆社的地位〉，收於李壬癸編著，《新港文書研究》，頁 631-640。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2010 《珍惜臺灣南島語言》。臺北：前衛出版社。
- 李壬癸 (編著)
2010 《新港文書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李國銘
2004 《族群、歷史與祭儀：平埔研究論文集》。臺北：稻鄉出版社。
- 松方冬子 Matsukata Fuyuko
2007 《オランダ風説書と近世日本》。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 林昌華
2006 〈十七世紀中葉荷蘭改革宗教會對北部臺灣原住民的教化：以 Marcus Masius 牧師的淡水與基隆教務報告書為中心而述〉，收於呂理政主編，《帝國相接之界：西班牙時期臺灣相關文獻及圖像論文集》，頁 179-207。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 林偉盛 (譯)
2001 〈荷據時期教會工作史料選譯 (五)〉，《臺灣文獻》52(4): 177-218。
- 邱馨慧
2001 〈家、物與階序：以一個排灣社會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9 〈由原住民史料再論一五八二年臺灣船難地點〉，《臺灣文獻》60(3): 1-32。
2012 〈近代初期臺灣原住民的「消費者革命」〉，收於林玉茹主編，《比較視野下的臺灣商業傳統》，頁 441-477。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 查 忻
2011 〈荷蘭改革宗教會在十七世紀臺灣的發展〉。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
- 茂住實男 Mozumi Jitsuo
1987 〈文法=訳読法の成立過程〉，《日本英語教育史研究》2: 133-149。
- 徐興慶
2007 〈德川幕末知識人吸收西洋文明的思想變遷〉，《臺大歷史學報》40: 149-199。
- 翁佳音
1990 〈一件單語新港文書的試解〉，《民族學研究所資料彙編》1: 143-152。
1998 《大臺北古地圖考釋》。臺北：臺北縣立文化中心。
2000 〈地方會議、賸社與王田：臺灣近代初期史研究筆記(一)〉，《臺灣文獻》51(3): 263-281。
2008 〈新港有個臺灣王：十七世紀東亞國家主權紛爭小插曲〉，《臺灣史研究》15(2): 1-36。

康培德

- 2008 〈紅毛先祖？新港社、荷蘭人的互動歷史與記憶〉，《臺灣史研究》15(3): 1-24。

曹永和

- 1979 《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0 《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國棟

- 2005 〈從四個馬來詞彙看中國與東南亞的互動：Abang, Kiwi, Kongsil 與 Wangkang〉，收於陳國棟，
《東亞海域一千年》。臺北：曹永和文教基金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頁 127-162。

程紹剛（譯註）

- 2000 《荷蘭人在福爾摩沙》。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費德廉、羅效德（編譯）

- 2006 《看見十九世紀臺灣：十四位西方旅行者的福爾摩沙故事》。臺北：如果出版社。

賀安娟（Ann Heylen）

- 1998 〈荷蘭統治之下的臺灣教會語言學：荷蘭語言政策與原住民識字能力的引進（一六二四～一六六二）〉，《臺北文獻》125: 81-119。

葉春榮（編譯）

- 2011 《初探福爾摩沙：荷蘭筆記》。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劉克襄

- 1992 〈西方人在打狗的休閒生活〉，收於劉克襄譯著，《後山探險：十九世紀外國人在臺灣東海岸的旅行》，頁 144-164。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劉序楓

- 2012 〈近代華南傳統社會中「公司」型態再考：由海上貿易到地方社會〉，收於林玉茹主編，《比較視野下的臺灣商業傳統》，頁 227-266。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潘富俊

- 2007 《福爾摩沙植物記：101 種臺灣植物文化圖鑑&27 則臺灣植物文化議題》。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韓家寶、鄭維中（譯著），王興安（編校）

- 2005 《荷蘭時代臺灣告令集、婚姻與洗禮登錄簿》。臺北：曹永和文教基金會。

Anonymity

- 1975 "East Indian Dutch." In John E. Reinecke, ed., *Oceanic Linguistics Special Publications 14: A Bibliography of Pidgin and Creole Languages*, pp. 338-339. Honolulu: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Blussé, Leonard 包樂史, Natalie Everts, and Evelien Frech (eds.)

- 1999 *The Formosan Encounter. Notes on Formosa's Aboriginal Society: A Selection of Documents from Dutch Archival Sources. I: 1623-1635*. Taipei: Shung Ye Museum of Formosan Aborigines.

Blussé, Leonard and Natalie Everts (eds.)

- 2000 *The Formosan Encounter. Notes on Formosa's Aboriginal Society: A Selection of Documents from Dutch Archival Sources. II: 1636-1645*. Taipei: Shung Ye Museum of Formosan Aborigines.

- 2006 *The Formosan Encounter. Notes on Formosa's Aboriginal Society: A Selection of Documents from Dutch Archival Sources. III: 1646-1654*. Taipei: Shung Ye Museum of Formosan Aborigines.

- Blussé, J.L., M.E. van Opstall, Yung-ho Ts'ao, Shu-sheng Chiang, and W. Milde (eds.)
1986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1629-1662, DEEL I: 1629-1641*. Den Haag, Nederland: 's-Gravenhage verkrijgbaar bij martinus Nijhoff: Bureau der Rijkscommissie voor Vaderlandse Geschiedenis, 's-Gravenhage.
- Blussé, J.L., W.E. Milde, Yung-ho Ts'ao, and N.C. Everts (eds.)
1995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1629-1662, DEEL II: 1641-1648*. Den Haag: Instituut voor Nederlandse Geschiedenis.
- Blussé, J.L., W.E. Milde, and Yung-ho Ts'ao (eds.)
1996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1629-1662, DEEL III: 1648-1655*. Den Haag: Instituut voor Nederlandse Geschiedenis.
- Beauclair, Inez de 鮑克蘭
1970 "Dutch Beads on Formosa? An Ethnohistorical Note."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29: 385-402.
- Boxer, C.R.
1965 *The Dutch Seaborne Empire: 1600-1800*. New York: Knopf.
- Brachin, Pierre (Author), Paul Vincent (Trans.)
1985 *The Dutch Language: A Survey*. Cheltenham: Thornes.
- Burke, Peter
2005 *Towards a Social History of Early Modern Dutch*.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 Campbell, W. M. 甘為霖 (ed.)
1896 *The Articles of Christian Instruction in Favorlang-Formosan, Dutch and English, from Vertrecht's Manuscript of 1650, with Psalmanazar's Dialogue between a Japanese and a Formosan and Happart's Favorlang Vocabulary*. London: K. Paul, Trench, Trübner&co.
1992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Described from Contemporary Sources with Explanatory Notes and a Bibliography of the Island*.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 Chiu, Hsin-hui 邱馨慧
2008 *The Colonial 'Civilizing Process' in Dutch Formosa, 1624-1662*. Leiden; Boston: Brill.
- Errington, Joseph
2001 "Colonial Linguistic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30: 19-39.
2008 *Linguistics in a Colonial World: A Story of Language, Meaning, and Power*. Malden, Mass; Oxford: Blackwell.
- Gaastra, Femme S.
2003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Expansion and Decline*. Zutphen: Walburg Pers.
- Goodman, Grant K.
2000 *Japan and the Dutch, 1600-1853*. Richmond, Surrey: Curzon.
- Groeneboer, Kees
1993 *Weg tot het Westen. Het Nederlands voor Indië, 1600-1950. Een Taalpolieke Geschiednis*. Leiden: KITLV.
1994 "The Dutch Language in Maluku under the VOC." *CAKALELE* 5: 1-10.

Groeneboer, Kees (Author), Myra Scholz (Trans.)

1998 *Gateway to the West: The Dutch Language in Colonial Indonesia, 1600-1950: A History of Language Policy*.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Heylen, Ann 賀安娟

2001 "Dutch Language Policy and Early Formosan Literacy (1624-1662)." In Wei-ying Ku, ed., *Missionary Approaches and Linguistics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pp. 199-251. Leuven: Ferdinand Verbiest Foundation;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Hoetink, Benard

1917 "So Bing Kong, het Eerste Hoofd der Chineezten te Batavia, 1619-1636." [So Bing Kong, the first head of the Chinese in Batavia, 1619-1636.] *Bijdragen tot de Taal-, Land-, en volkenkunde (BKI)* 73: 344-415.

Jacobs, Els M.

2006 *Merchant in Asia: The Trade of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during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eiden: CNWS Publications.

Koolen, Ben

2011 *VOC & Onderwijs: Een Inventarisatie*. Assen: Boekwinkeltjes.

Li, Paul Jen-kuei 李壬癸

2005 "Notes on Favorlang, an Extinct Formosan Language." In Dah-an Ho and Ovid J. L. Tzeng, eds., *POLA Foever: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Professor William S-Y Wang on His 70th Birthday*, pp. 175-194.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Manson, Patrick (A Former Resident) 萬巴德

2008 "A Gossip about Formosa." In Hsiu-Jung Chang, ed., *A Chronology of 19th Century Writings on FORMOSA: From The Chinese Repository,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The China Review*, pp. 428-440. Taipei: Ts'ao Yung-ho Foundation for culture and education.

Numata, Jiro 沼田次郎

1964 "The Introduction of Dutch Language." *Monumenta Nipponica* 19(3/4): 243-253.

Oers, Ron van

2000 *Dutch Town Planning Overseas during VOC and WIC Rule (1600-1800)*. Zutphen: Walburg Pers.

Ramos, Teresita V.

1971 *Tagalog Dictionar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Robson, Stuart and Singgih Wibisono

2002 *Javanese English Dictionary*. Hong Kong: Periplus Editions; North Clarendon, VT: Tuttle Pub.

Shellabear, W.G. (William Girdlestone)

2012 *An English-Malay Dictionary*. Charleston, SC.: BiblioLife.

Steere, Joseph Beal (Author), Paul Jen-kuei Li (ed.)

2002 *Formosa and Its Inhabitants*. Taipei: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Preparatory Office, Academia Sinica.

Steere, J.B.

- 2008 “The Aborigines of Formosa.” In Hsiu-Jung Chang, ed., *A Chronology of 19th Century Writings on FORMOSA: From The Chinese Repository,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The China Review*, pp. 453-459. Taipei: Ts’ao Yung-ho Foundation for culture and education.

Stevens, Alan M. and A. Ed. Schmidgall-Tellings

- 2004 *A Comprehensive Indonesian-English Dictionary*.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Sugimoto, Tsutomu 杉本つとむ

- 2000 “Hendrik Doeff and the Doeff’s Halma.” In Leonard Blussé, Willem Rammelink and Ivo Smits, eds., *Bridging the Divide: 400 Years The Netherlands-Japan*, pp. 125-126. Hilversum: Teleac/ NOT; Leiden: Hotei Publishing.

Tanaka-Van Daalen, Isabel

- 2000 “Dutch Words and Expressions in Japanese.” In Leonard Blussé, Willem Rammelink and Ivo Smits, eds., *Bridging the Divide: 400 Years The Netherlands-Japan*, p. 129. Hilversum: Teleac/ NOT; Leiden: Hotei Publishing.

The Indonesian Etymological Project

- 2007 *Loan-Words in Indonesian and Malay*. Leiden: KITLV Press.

Thomason, Sarah Grey and Terrence Kaufman

- 1988 *Language Contact, Creolization, and Genetic Linguis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Torii, Yumiko 鳥井裕美子

- 2000 “ ‘Dutch Studies’: Interpreters, Language, Geography and World History.” In Leonard Blussé, Willem Rammelink and Ivo Smits, eds., *Bridging the Divide: 400 Years The Netherlands-Japan*, pp. 117-137. Hilversum: Teleac/ NOT; Leiden: Hotei Publishing.

Tryon, Darrell T., et al. (eds.)

- 1995 *Comparative Austronesian Dictionary: An Introduction to Austronesian Studies Part 4*. Berlin;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Valentijn, F.

- 1724-1726 *Oud en Nieuw Oost-Indiën: Vervattende een naauwkeurige en uitvoerige verhandelinghe van Nederlands mogentheyd in die gewesten*, 5 vols.. Amsterdam: Van Braam, Onder de Linden.

Van Kerckvoorde, Colette M.

- 1993 *An Introduction to Middle Dutch*. Berlin;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Vlis, C.J. van der

- 1842 “Woorden-lijst der Formosaansche taal, volgens een handschrift in de bibliotheek der Utrechtsche Acaemie aanwezig.” In *Verhandelingen van het Bataviaasch Genootschap van Kunsten en Wetenschappen* 18: 453-483.

Widjojo, Muridan

- 2009 *The Revolt of Prince Nuku: Cross-Cultural Alliance-Making in Maluku, c.1780-1810*. Leiden; Boston: Brill.

Wills, John E. Jr. 衛思韓

- 1977 “The Hazardous Missions of a Dominican: Victorio Riccio, O. P., in Amoy, Taiwan, and Manila. Les missions aventureuses d'un Dominicain, Victorio Riccio.” *Actes du IIe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Sinologie: les rapports entre la chine et l'Europe au temps des Lumières*. French, pp. 231-243; English, pp. 243-257.

Yajima, Suketoshi 矢島祐利

- 1964 “The European Influence on Physical Sciences in Japan.” *Monumenta Nipponica* 19(3/4): 340-351.

Zandvliet, Kees 冉福立

- 2006 “Art and Cartography in the VOC Governor’s House in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aiwan: The Representation, Interpretation and Identity of Taiwan*, pp. 72-98. Taipei: National Culture Association and the Taiw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May 29-30.

Colonial Linguistic Phenomena and Legacy of Dutch Formosa with Reference to Dutch Learning in Early Modern Monsoon Asia

Hsin-hui Chiu

ABSTRACT

This article depicts how Dutch language developed in the colonies and settlements of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VOC) through its linguistic policies during the Early Modern Era when the company started commercial and colonial expansions in the region of Monsoon Asia. The author then focuses on Dutch learning in the context of missionary and educational activities, among the Taiwan Indigenous Peoples from the central to southern Taiwan.

The Company's domain under discussion includes the Moluccas and Java in Island Southeast Asia, as well as Ceylon in South Asia where the Company set governors as the chair of offices; additionally, Japan stood for the example of learning Dutch in an economically important factory. The former represented the unsuccessful ending of the promotion of Dutch language under local linguistic surroundings with must more often used *lingua franca*, Malay and Portuguese. The latter provided an active model motivated by the practical necessity of commerce and the prerequisite of the fact that the Dutch as the only cultural mediators when Japan isolated itself from the world. The Shogun ordered scholars to learn Dutch. However, Dutch learning also attracted other intellectuals interested in new knowledge spread from Europe, and they finally found the study of *rangaku* leading to the opening of countr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aiwan had been seen as the most outstanding case of Dutch learning compared to other areas where the Company operated its policies of Dutch education for the local people, though Formosan language situation was not simple at that time. By analyzing extant indigenous orthographic materials, the author investigates lexical borrowing and its historical connection by language contact. The study reveals the following phenomena: First, the influence of Tagalog and Malay in Siraya. Second, the Minan Dialect as a

foreign language can be the most frequently adopted and bastardized in both Siraya and Favorlang during the Dutch period of Taiwan. Third, even though the Dutch had not established a school in Paiwanese region, it was possible for the Paiwanese to preserve more Dutch linguistic elements due to their own social-cultural institutions as a hierarchical society. The last, one example of “*pa*” concerning tax-farms introduced by the Company showed the adoption of Dutch words in Minan Dialect and Paiwanese language. Furthermore, its idea of meaning and even related activities continued in present-day southern Taiwan, which may be perceived as the part of Dutch legacy in Formosa.

Keywords: Dutch Languag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VOC), Colonial Linguistics, Taiwan Indigenous Peoples, Monsoon Asia